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任世红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3年 第6期 总第146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本期特稿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认知逻辑 / 柴 奕 齐卫平 4

政党制度

算法视阈下西方选举制度研究——以当前美国选举失效为例 / 杜勇宏 王汝芳 13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政治协商的内涵、逻辑与建设路径 / 金 文 19

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应然定位、实然困境与适然路径 / 于 江 27

统战理论与实践

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工作创新机制研究 / 祁雪春 34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网络统战的潜在挑战及其应对 / 吉 强 41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 年 1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的智慧与启迪 / 张扬全 李一锴 50
- 全面深刻认识并有效维护信息安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安全的重要论述 / 黄 丽 57
-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述评:回顾、剖析、展望 / 谭玲姿 63
-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以陕西为例 / 王晓芸 71

学习与思考

- 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破解路径——以 N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 张 松 76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3 - 06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认知逻辑

柴 奕 齐卫平

摘 要:在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新概括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论断,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力,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确立实事求是的新指南,增强人类文明形态创造的新自觉,提升发挥主动精神的新高度。全面把握“第二个结合”新概括,深刻认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论断蕴含的重大价值,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着力在“第二个结合”上扎实下功夫,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思想深邃的精辟论述,强调必须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新的文化使命”。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论断。“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任务,“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确立实事求是的新指南、增强

人类文明形态创造的新自觉、提升发挥主动精神的新高度等方面理解这个新论断的重大价值,有助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和行动逻辑。

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力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深刻认知,也是党的历史传统。坚持和发扬这个历史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

收稿日期:2023-11-02

作者简介:柴奕,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合。当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2] 什么时候结合得好，党就能兴旺发达，什么时候不能很好地结合，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这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3]。这是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新概括。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4]。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5]。从发展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和实践深入推进的历程，形成“两个结合”新概括，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结出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6]。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两个结合”作出新概括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底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始终秉持批判性继承、扬弃中发展、传承中创新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汲取一切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基本方针。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内涵其中。“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中国文化，不能很好地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缺少了重要根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时，把它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相联系的思想逻辑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辩证关系、价值内涵和内在机理，强调“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7]。“两个结合”新概括的深深刻意蕴在于突出了文化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分量，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强大力量。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是党和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锻造红色文化、建设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充足底气。“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作为“两个结合”新概括中的新论断，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两个结合”时突出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第一，从“两个结合”相互成就角度指出，“第二个结合”把两个来源不同的思想文化有机连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彼此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角色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中。第二，从拓展道路的文化根基角度指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吸收了

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9]，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资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重要保证。第三，从发挥主动精神角度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有助于迸发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力量，在面向未来的创新探索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文化空间。第四，从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律角度指出，“第二个结合”体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0]。这“三个新高度”的揭示与深刻把握“三大规律”的要求相吻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发展，是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加深“两个结合”新概括的认识，必须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是党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新论断的重大意义。党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带来社会发展的契机，每一个历史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延安时期进行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党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期以思想解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断实现思想解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发展的实践遵循。“第二个结合”新论断促进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释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的巨大能量，必将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产生深远影响。

二、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认知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历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总结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所作出的全新理论阐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理论嬗变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认知，也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实践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形成新认知的思想解放历程。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在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毛泽东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1962年12月，毛泽东会见外宾，当客人提到“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毛泽东始终把自己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他谦逊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追求、揭示、笃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就是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事实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就有把它“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2]的初步认识。但这样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的，幼年时期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 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大批新党员、新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 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13]。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坚持反对“本本主义”的经验为思想基础，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要求全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4]。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5]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实践，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思想解放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应时代发展要求，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同时，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突破，那就是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开辟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宽阔平台。

思想解放的含义就是既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的“老祖宗”丢掉，又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束缚自己手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实践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解决具体问题则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担当和完成。缺乏思想解放的自觉，局限于经典文本中的知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就难以常青，真理伟力就难以彰显。反思党的历史上遭遇挫折和失败的经历，思想不解放的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束缚于书本上学到的原理知识，造成的思维僵化使马克思主义偏离了中国化的发展轨道。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术语，也没有直接可以照搬使用的思想原理。这些原创性概念、发明性术语和创新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形成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实践推进中形成的新认知，体现在一次次思想解放中达到的新高度。

党的事业根植于中国实践，其发展一刻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沃土。从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包含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中。然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揭示出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论断，则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新认知。新时代伟大变革孕育诞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6]。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强大的文化力量引领时代，以坚实的文化基础增强国家认同，成为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指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两个大局”的情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构想与描绘。“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有机组合的“化学反应”，结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都成功融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理念一脉相承，福祉世界的胸怀天下理念与“天下一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所崇尚的发展原则。“第二个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认知，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新路径，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推

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新的时空领域，为党推动思想解放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

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确立实事求是的新指南

思想解放的要旨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话语用中国语言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经典阐释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7]。这个“矢”与“的”关系的阐述，十分透彻地讲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找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以及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好、运用好的道理。因此，实事求是体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遵循。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中深刻认识发展的内部联系，在“实事”中“求是”的指向就是从中发现和把握规律性，从而促进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旨在不断深化对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规律认识，不断形成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规律把握。这些规律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深入展开，有的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揭示，但很多规律性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可以直接搬用的现成答案，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加深认识。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看，坚持实事求是成为深化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助推器，规律的新认识建立在一切实从实际出发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千秋伟业正是在逐渐加深认识和深刻把握规律中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行动自觉中不断迈出有力的步伐。

如果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实事求是的题中之义的话，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则为坚持实事求是确立了新的行动指南。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鲜明体现，更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亘古不断、绵绵不绝，不能简单地用“奇迹”二字来形容。灿烂文明的背后，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为探寻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不断追寻、上下求索，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独特且深刻的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之路就是一条不断探索真理的“实事”之路和“求是”之途，在发现、揭示和遵循规律中勇往直前的品质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绵发展流传下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和有效运用。

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就意味着不能什么都以书本为依据，一切都照搬原理的条文。“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8]这个传统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对待科学理论、对待理论创新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密钥就是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教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上彰显得更加充分，密钥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扎根中国的土壤，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实现创造性的发展，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准则，也是不断推进思想解放的演进逻辑。

思想解放回应实事求是的要求，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之“矢”和中国具体之“的”的关系认识固化不变，使理论落后于实践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9]永无止境的实践总是产生新情况新问题，真理的追求、揭示、笃行一刻也

不能停止前进的步伐。“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20]，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来说，“第二个结合”体现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在于形成了文化资源拓展的新维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坚持真理中深化认识和创新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保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要求思想不断解放，思想解放才能迈出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步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新论断揭示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契合的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不断创新发展推动历史进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促进思想解放为实事求是确立起新的行动指南。

四、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增强人类文明形态创造的新自觉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思想和实践创新的历史汇总，每一次文明的创造都体现为思想解放的结果，每一个文明成果的产生都体现为思想解放的结晶。历史在思想解放中前进，有思想解放才有历史进步，人类文明得益于思想解放而不断生长出新枝新芽，世界格局借助思想解放而不断进行着重塑再造。

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个重大创新成果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

探索和实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创新突破的发展，取得了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的收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它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而且也为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2]党的二十大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体现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自觉程度进一步提升。

人类社会在文明形态创造中前进，世界历史在文明成果涌现中发展。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为人类社会作出了无比重大的杰出贡献。世界进入近代后，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发展形成的西方文明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新文明的创造改变了世界进程。客观而言，现代化创造的文明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福祉，丰富的物质财富、便捷的交通工具、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的社会往来、完备的生活设置、畅通的信息网络刷新了人类生活的幸福感。然而，现代化又像一把正负交织的双刃剑，它在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诸多弊端也使各国面临普遍的发展障碍和思想困惑。尤其是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霸权主义，把现代化模式标准化，造成“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西方文明打压、排斥、诋毁人类社会其他文明，严重掣肘了世界历史的正常发展。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文明多元、多样、多姿的发展才构成世界的色彩斑斓。“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23]现代化从来就没有千篇一律、铁板钉钉的固定模式，也从来就没有到处适用、不可置换的普遍标准，各国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搞现代化才能争取成功

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基于自身国情打造中国特色，基于独特优势创造出与西方现代化本质不同的新文明形态。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伟业和伟大创举，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把体现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打造更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相统一，把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与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相统一，把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把关怀中国人民幸福与福祉世界各国发展相统一，凸显了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崇高境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鲜明特色，这些图景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样式的呈现，显示了自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觉醒。

“第二个结合”体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重大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有了文化根基的坚实支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很多重要元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富民厚生、义利兼顾、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些思想资源展现了古代前人先贤思考人类生活和世界发展的卓越智慧，丰富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既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竭的思想宝藏，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用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中华文明的宝贵思想资源，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体现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落实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整个过程。

五、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升发挥主动精神的新高度

党的二十大号召全党同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24]。迈上新征程，新的使命任务砥砺百年大党接续奋斗再出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驱动力。充分发挥主动精神，是党和人民再接再厉、勇毅前行需要始终保持的精神状态。

主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被动常和逼迫之下的无奈相关。发挥主动精神要求对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有足够的自信，历史自信激发历史自觉，提升历史主动。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这三个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而“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25]。这就把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紧密结合起来，对党和人民充分发挥主动精神提出了实践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6]，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27]。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历史主动”，就是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跟随时代前进步伐，顺势而上、主动作为，为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提供保证。

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历

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28]。马克思主义注重物质的力量，同时也强调精神的作用。所谓“历史主动”，不是说历史会自发地发展、自然地演进，而是指人们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所谓“主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指人们的主观力量能够在历史实践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它是一种自我发现和力量彰显。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9]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实践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过程，随着历史不断演进和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主动的精神力量不断获得提升。

主动精神在党的奋斗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使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诸多困难而无所畏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大考验而无往不胜。“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30]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发展，只有立足中国大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才能走出一条福祉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持和信仰坚守，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维护和精神弘扬。

文化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生成，也深刻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从命运为别人所操纵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经历中深深认识到，充分发挥主动精神的中国

人民将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不可战胜的。

党的二十大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1]。新征程已经扬帆起航，充分发挥主动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要在文化层面下功夫，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篇大文章。“两个结合”相向而行，以深刻的“化学反应”互相成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自我，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根本依托^[32]。“第二个结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动力，党和人民发挥主动精神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高度。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33]。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难以走在时代前列，没有正确思想指导的政党难以引领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路走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伟大变革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和举世瞩目的辉煌，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这个精神表现的最大亮点就是党和人民意志越来越坚定、思想越来越自觉、行动越来越有力、底气越来越充足、能力越来越强大。“两个结合”新概括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论断，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明了方向。“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把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就能够形成强大的优势。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汲取给养和能量，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就有了更加丰沃的土壤，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就有了更加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6][7][9][10][21][32][3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9、6、6、9、9-10、7-8、8、10-11.
- [2][11]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五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53、174.
- [3][8][28][3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83、33、419、418.
- [4][2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4、62.
- [5][19][24][3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4、14、2、22.
- [12] 李大钊文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
- [13][14][15]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10-611、534、614.
- [1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0.
- [17]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1.
- [18] 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37.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0.
- [22][25]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3、538.
- [23]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89.
- [2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
- [29]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责任编辑: 王天海

算法视阈下西方选举制度研究

——以当前美国选举失效为例

杜勇宏 王汝芳

摘要:美国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的混乱不堪及随后引发的社会骚乱,促使人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选举制度进行再反思。本文在深入考察竞争性选举制度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从信息处理和集成算法角度讨论了西方选举制度的算法本质,发现其本质是集成算法中的投票法;然后基于投票法有效的条件从理论上探讨西方选举制度有效的前提条件,并结合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信息技术特点,得出了西方选举制度已不可逆地进入失效状态的结论;最后以美国为例,分析了西方国家选举失效的根本原因。本文从数理角度揭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选举制度失效的历史必然性,也侧面为我国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新的逻辑支撑。

关键词:西方选举;有效性;信息处理;集成算法;投票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的混乱不堪,以及随后引起的骚乱事件,将美国社会群体的高度撕裂和美国选举制度的深层弊病,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在反思美国选举制度的同时,也对以竞争性选举制度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制度的衰败进行深入思考。

近现代西方选举制度是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旨在用投票的方式选择优秀领导者,通过响应即时性民意明确国家统治权,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本主义革命初期政治斗争的无序状态,减少了为争夺政权

而引发的血腥灾难,有历史进步性与现实意义。西方选举制度是一种代议制度,基于多数决和竞争性原则,是一个简单而又便捷的汇集民意的办法,但显然不是达到真理或最优决策的方法,更不是真假对错的取决标准。换言之,选举不仅要确保领导人的更替和平稳定,还要力求选出的领导人能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民意代表性和治理有效性就是判断一国或地区选举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显然,美国近年的选举没能有效实现这一目标,领导人的更替未能和平稳定进行,以至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被质疑,社会秩序被破坏。

收稿日期:2023-09-15

作者简介:杜勇宏,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应用统计学及机器学习;王汝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产业创新政策及参政党理论。

不少学者和政客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盖尔曼等把 2016 年和 2020 年美国选举的崩溃归结于特朗普^[1]。福山认为,政治极化和通信技术加剧了“民主商议之共同事实基础的消失”^[2]。斯蒂格利茨认为所谓选举民主事实上成为资本力量的博弈^[3]。马凯硕指出,美国现今的社会契约抛弃了“平等”,只剩“自由”这一支柱,从民主国家走向富豪统治国家^[4]。金太军、王中原等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文化、社交媒体和选举制度本身等对西式选举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力量操纵、身份政治、移民问题、政党恶斗、选民短视、贫富极化、信息和媒体操纵是影响西方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因^{[5][6]}。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正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一切皆算法”成为更本质的思维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万物互联且都成为数据,所有选择都依赖数据并产生新的数据,政治经济社会中一切依赖数据以决策的体系都是一个的数据处理系统,不同的决策机制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算法^[7]。能够有效获得数据、有效处理数据和算法效率更高的机制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得以发展,反之就可能被淘汰。因此,有必要从数据和算法的逻辑角度来审视西方选举制度,分析美国选举失效的根源。本文在深入考察西方选举制度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其算法本质,并基于投票法有效的条件提出了选举制度有效的必要条件,而后以美国选举为例说明了西方选举失效的历史必然性。

二、从算法角度看西方选举的本质

西方选举通过汇集选民分散的意见,根据选举规则选出领导人,从而解决自下而上的授权和国家治理问题,其机制是数量导向性的,通过计

算选票获得一定规则下占优势的“众意”。投票是一种信号机制,其中呈现和测量选民意见信息的载体是选票,选民通过投票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发出满意或不满意的信号(选举信息运行方式及特性见表 1)。

候选人是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和发布者(信息源),向选民传播自己的竞选主张,反对和批评其他候选人的主张,以影响选民的判断和认识,争取选民给自己投票。选民接受候选人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判断。虽然候选人也会重视选民意见反馈,但大多时候选民不能即时向候选人反馈或对信息运行过程施加个人影响。所以,选举的信息结构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8]。为避免过多或复杂的信息导致投票过程难以运行和操作,保证信息处理的过程能够实现高度程序化,选票上通常只有有限的选项,形成标准化的信息,并不反映选民支持或反对的程度上的差异。这种高度简化的信息输出,极大地降低了选民投票的知识负担,有利于对大规模的选票按规则进行程序化处理和加总计算,降低选举成本。这种数据处理过程,与机器学习中的集成算法类似,尤其选举的数量导向结果与集成算法中的投票法如出一辙。

在机器学习中将多个分类器的结果统一成一个最终的决策学习方法,统称为集成算法,其中每个单独的分类器称为基分类器。集成算法的思想类似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有综合参考足够多的数据,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建议,得到的结论才能更可靠,作出的决策才能更科学更有效。投票法是一种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简单的集成算法,其基本思想是,把票数最多或概率最高的类作为赢家^[9]。根据集成规则不

表 1 选举信息运行方式及特性

功能作用	载体格式	信息结构	信息密度	信息集成	集成结果	优点
挑选候选人或方案	一人一票,标准化的官方制作选票	以候选人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	信息密度低,候选人的简单信息及有限选项	投票法,当选门槛、选区规模和选举方式	多数决,零和博弈,极化	容易计算,方便处理,成本较低,确定性高

同，投票法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以得票过半数的类为最终结果的绝对多数投票法，以得票最多的类为最终结果的相对多数投票法和在计算最终结果时对不同的基分类器赋予不同权重的加权投票法。根据输出类型不同，投票法又可分为硬投票（类标记）和软投票（类概率）两种：硬投票法在每个模型中都是赢家获得所有票，而后再统计每个模型的票数，得票数最多的类为最终赢家；软投票法先统计每个模型中的概率，而后计算总概率——可以设置不同或相同的权重，概率最高的类为最终赢家。对于同一个数据集，硬投票和软投票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不同权重的投票法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从本质上讲，选举就是个人偏好信息的程序化表达及集成过程，每张选票就是一个基分类器，不同计票方法和加总规则的选举制度对应着集成算法中不同的投票法。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等原因，西方各国选举制度的选择和设计都不完全一样——主要体现在当选门槛、选区规模和选举方式的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选举是由州立法机关选出的选举人团进行选举，每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数不同——众议员人数（与人口成比例）加上参议员人数（每个州两名），即权数不同，所以是加权投票法。每个州都是赢家通吃，而后再统计选举人团的票数，得票数最多的类为最终赢家。因此，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对应着加权的硬投票法。

三、投票法与选举有效的条件

算法是针对问题从一个有限的假设空间中搜索最适合结果的策略机制。这意味着有效的算法

应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假设空间中包含了合适的方案或者选项中包含了所有合适的对象；二是假定最优方案存在假设空间中，模型能无偏搜寻到最优方案^①。同理，选举有效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候选人应包含了所有合适的人；二是假设合适的人在候选人中，选举制度能搜寻到这个人，即选举规则不能被破坏，选举过程不应被操纵以致排除最优结果。这两条适用于所有算法，也包括集成算法。除此以外，欲保证投票法有效，还要满足个体有独立性（差异性）、高精度，投票数量足够多三个条件。

（一）个体要有独立性（差异性）

基分类器的差异性对投票法的重要性，与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的重要性如出一辙。通过计算不同情况下集成后模型的方差，可以证明个体差异性对集成算法的重要影响。若各基分类器独立（有差异性），此时集成将显著降低方差，提升性能；若各基分类器完全相等（无差异性），此时集成不会降低方差，无法提升性能；若各基分类器之间的差异属于上面两个极端状况的中间态，投票法可一定程度降低方差，提升性能。图1显示了不同情况下集成效果^①：a显示，因个体有差异，集成后性能提升；b显示，因个体无差异，集成不起作用。这意味着，选举投票有效必须保证个体选民思想的独立性，即个体选民思想的“差异性”或者说“多样性”。

（二）个体要有高精度

假设N个基分类器的单个出错率都是p，且相互独立，则N个基分类器的结果中出现i个错

	测试例1	测试例2	测试例3	测试例1	测试例2	测试例3	测试例1	测试例2	测试例3		
h_1	√	√	×	h_1	√	√	×	h_1	√	×	×
h_2	×	√	√	h_2	√	√	×	h_2	×	√	×
h_3	√	×	√	h_3	√	√	×	h_3	×	×	√
集成	√	√	√	集成	√	√	×	集成	×	×	×

(a) 集成提升性能

(b) 集成不起作用

(c) 集成起负作用

图1 不同类型基分类器集成的效果比较

注①：资料来源《机器学习》。

误的数量服从二项分布，对采用投票法（简单多数投票）来说，集成后模型的错误概率是：

$$\mu = \sum_{i=m}^N \binom{N}{i} p^i (1-p)^{N-i} \quad (1)$$

其中 $m = (N+1)/2$ 。由公式（1）可以证明：只要基分类器的性能优于随机猜测（ $p < 0.5$ ），集成后的错误概率 μ 总是小于单个基分类器的错误概率 p ；若基分类器的性能劣于随机猜测（ $p > 0.5$ ），集成模型的错误概率 μ 反而大于单个基分类器的错误概率 p 。这意味着，选举投票若要有效就须保证个体选民政治素质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以确保选对人的概率大于 50%。

（三）投票数量足够多

由公式（1）可以证明，若 $p < 0.5$ ， $N \rightarrow \infty$ 时，则 $\mu \rightarrow 0$ ；若 $p > 0.5$ ， $N \rightarrow \infty$ 时，则 $\mu \rightarrow 1$ 。也就是说，如果基分类器数量足够多且有高精度（ $p < 0.5$ ）和多样性，集成后模型的错误概率 μ 将接近于 0，准确概率接近于 1；若 $p > 0.5$ ，集成模型的错误概率 μ 接近于 1，准确概率接近于 0。这意味着选举投票有效必须在精度和多样性的基础上确保投票率够高，或者说政治素质高、思想独立的选民投票的数量要足够多。

综上所述，欲保证投票法有效，需要具备五个条件，即选项中包含了所有合适的对象、模型可无偏搜寻最优方案、投票个体有高精度、投票个体有差异（多样）性和投票数量足够多。相应地，西方选举若想有效也必须具备五个先决条件：一是有才能的人应该具备候选资格；二是选举不应受到操控，以保证最优候选人不因政治操控被排挤；三是选民政治素质高，有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四是选民思想有独立性，不盲从；五是选民投票参与率足够高。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保障选举有效的苛刻性条件总是难以企及，选举失效将是常态现象。换言之，其有效是偶然或阶段性的，有效也是相对的，失效是更一般意义地广泛存在。

西方国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初都是少数

富裕成年白人男性的特权，政治参与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经历长期的斗争被逐步废除，至 20 世纪才先后实现普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转变为大部分成年公民普遍享有的一项权利。例如，美国、英国分别于 1965 年、1970 年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普选前的西方选举制度，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代表性，其有效性无从谈起。普选之后至苏联解体前，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人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干预受到重视，金融自由化受到严格管制，劳资关系走向妥协，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健全，西方选举制度展现出了相对的有效性。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全球金融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进入 21 世纪后，以美国异化为金融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及人民对资本剥削的抗议和日益高涨的抗争运动为标志，资本主义转至衰落^[1]，西方国家社会分裂加剧，西方选举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失效态势。

四、算法视域下西方选举失效根源分析

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束缚其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且难以自救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不断激化，选举的制度缺陷不断显性化，西方选举已不可逆地进入失效状态，国家治理凸显出重重危机。下面从算法视域下选举有效须具备的五个先决条件，对西方选举制度失效根源进行分析。

一是西方选举让富人群体实现对贫穷群体事实上的政治空间挤压，所谓选举已经沦落为属于少数富人的寡头政治。以美国为例，总统候选人既要善于筹集资金，本身也要有充足的启动资金——最初几个月通常要自付数百万美元。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和希拉里都自掏腰包，分别为选举花费了 1800 多万美元和 140 多万美元。同时，竞选总统还需要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推

选。美国前总统卡特说，“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12]。在2016年和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属任何政党的桑德斯以独立人士身份出现在选票上，虽然支持率很高，但因最终没有赢得党派支持而无缘终极对决。

二是西方选举始终在资本力量的掌控之下，成为资本操纵政治的公开合法的制度性平台。西方选举通过捐助制度和游说制度造就了“权钱交易”的政治市场^[13]，从候选人的产生、竞选宣传、参加投票到结果出炉的整个过程，都在资本力量的掌控之下。2010年和2014年，美国联邦法院分别作出取消集团直接捐助候选人禁令和个人捐助上限的裁定，更加夯实了美国民主的金钱政治根基，2020年美国大选总经费创纪录超140亿美元。另外，美国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使得大选中以选区划分和改变投票规则等手段或明或暗地操控选举的行为屡见不鲜。2020年大选中，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提起诉讼，称佐治亚州等四个州存在改变投票规则、未能保障每个县被公平对待的违宪行为。数字时代，利用带有偏向的搜索算法进行“微干预”，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轻易地改变超过20%的摇摆选民的投票偏好，特殊情况下甚至达到80%^[14]，近年来美国大选中关于“微干预”的报道和指责从未停止过。

三是选民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有意无意间总会表现出非理智倾向。据统计，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仅能处理简单的文字，无法归纳比较文章观点，820万人基本处于半文盲状态^[15]。同时，反智主义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民主体制和平等主义的情感”之中，致使整个社会无法进行关于真相的常识性讨论，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也就无一例外地被转化为“精神上的善恶大决战”^[16]。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普及，选举娱乐化，选民们对狗血荒诞剧情的关心胜于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以致2016年和2020年选举中希拉里的“邮件门”、特朗普的“通俄门”和拜登小儿子亨特的

“笔记本电脑门”令人应接不暇，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称，“从未想象过总统大选辩论的关注点并不在实际问题上”^[17]。

四是资本主义不断加剧的社会分裂导致社会结构异化，加之互联网效应，导致选民们更加偏执和盲从而丧失独立性。由于美国传统上就是两党制国家，两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被凝固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在与身份认同直接相关的移民、种族、同性恋、堕胎、宗教信仰等问题上不仅难有妥协的余地，而且越争论，社会就越撕裂。调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有六到七成认为对立党派是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威胁，有半数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邪恶”^[18]。互联网时代，不断分裂的人们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在内部相互反馈，不断互激，形成“回音室效应”^[19]，各种不同的偏见甚至具有“部落化”偏好特征的信息使得人们更加偏执和盲从，进一步导致选民的独立性丧失，从而无法具备选举有效所需的公共理性。

五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已明显下降，且参加投票的人与不投票的人有着明显群体性差异。近30年来，英国选民投票率一直在60%左右，年轻人的投票率由60%下降到40%；美国选民投票率一直在50%—60%，即使2020年达到66.9%，支持获胜者的比例仍不超过总体的40%。更严重的是群体结构性差异明显，非裔美国人和西裔美国人的投票率低于白人，穷人的投票率低于富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投票率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简言之，享有特权的人群投票率更高，本应是全体选民的合唱，结果吟咏的只是有权有势者的声音^[20]。弱势群体参与意愿低而放弃投票进一步导致其意愿得不到反映，以致投票结果越来越对权势群体有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化发展路径正从一元走向多元，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并将持续对人类社

会的生产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国家政治“金权化”、党争激烈、民众分裂导致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异化，选举过程娱乐化和信息技术“微干预”使得西方选举异化，等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强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将美国等西方国家选举推入了失效的境地。

参考文献：

- [1] 盖尔曼 . 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 [EB/OL].(2020-09-30).
https://www.guancha.cn/BartonGellman/2020_09_30_566785_s.shtml.
- [2] 福山 . 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加速衰败 [EB/OL].(2021-02-02).<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10202/2433884.shtml>.
- [3] 斯蒂格利茨 . 不平等的代价 [M]. 张子源, 译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112.
- [4] 马凯硕 . 中国的选择: 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M]. 全球化智库, 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209.
- [5] 金太军, 周义程 . 西式选举民主的病症与病根 [J]. 红旗文稿, 2016(17): 1-10.
- [6] 王中原 . 算法瞄准与智能选举: 算法如何重塑西方选举 [J]. 社会科学文摘, 2021(8): 31-34.
- [7] 赫拉利 . 未来简史 [M]. 林俊宏, 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333.
- [8] 韩志明 .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以民意信息处理为中心的技术分析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183-193.
- [9] 周志华 . 集成学习: 基础与算法 [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0: 65-75.
- [10] 周志华 . 机器学习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81.
- [11] 张文木 .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一)——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4): 19-97.
- [12] 刘皓然 . 美国前总统卡特: 美国民主已死 [EB/OL].(2015-09-25).<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PZTG>.
- [13] 刘敏军, 吴怀友 . 西方国家推崇的选举民主真相透视 [J]. 红旗文稿, 2018(11): 12-14.
- [14] Epstein, Robert, Robertson, et al. The 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 (SEM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Outcomes of Elec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33): 12-21.
- [15] The Survey of Adult Skills[EB/OL].(2016-06-28).<https://doi.org/10.1787/9789264258075-en>.
- [16] 霍夫施塔特 .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M]. 何博超, 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1: 58.
- [17] 2016 年总统竞选活动让美国丢脸 [EB/OL].(2016-11-02).http://m.haiwainet.cn/middle/232591/2016/1102/content_30463762_1.html.
- [18] 刘擎 . 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J]. 学海, 2021(2): 190-216.
- [19] 林奇 . 失控的真相 [M]. 赵亚男, 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4.
- [20] 梅塞尔 . 美国政党与选举 [M]. 陆贇, 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161.

责任编辑: 鲍跃华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政治协商的内涵、 逻辑与建设路径

金文

摘要:政治协商是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学界多从国家建设层面去认知政治协商,而从党的建设层面去探讨政治协商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从大统战工作格局视域看,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方略,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从政治实践到制度安排,是政治协商生成的历史逻辑;从文化传统到政治建构,是政治协商演进的理论逻辑;从中国实践到世界意义,是政治协商发展的现实逻辑。要推动政治协商制度的成熟定型,尚需从制度、主体和生态三个维度加以建设和完善。

关键词:政治协商;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建设路径;大统战工作格局

2022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1]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如何认识政治协商呢?目前学界对政治协商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源头论”,认为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源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是政治协商的当代发展^[2];另一种是“职能论”,认为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或民主党派的一项

职能^[3]。总体而言,这两种观点均从国家建设的层面去认识政治协商,却忽略了党的建设与政治协商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统一战线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的传统和作风”,“政治协商,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4]。显然,这段话深刻阐释了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和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从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视域,重新审视

收稿日期:2023-09-28

作者简介:金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制度研究”(22FDJB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政治协商的科学内涵及内在逻辑，优化政治协商建设路径提供了思路与方向。

一、政治协商的科学内涵

政治协商既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产物，也与西方民主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协商政治在中国有其独特传统。中国古代的“咨议”传统和近代的“资政”观念为现当代协商政治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铺垫，由此才有从“国是会议”“党派会议”到“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的确定过程^[5]。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协商实践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耦合，产生了火花。政治协商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产物，而协商民主则是晚近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两者的原生意义本无交集，我国学界将这一理论要素翻译为“协商民主”，就是有意要将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联系起来，助力这一制度的转型与发展^[6]。经过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将“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厘清政治协商与中国协商政治、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与联系，仅是界定政治协商内涵的第一步。事实上，我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协商”一词，最早是1945年由王世杰提出的，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认同^[7]。经过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早已定型。内容上，政治协商的基本议题是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形式上，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构成了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形式；程序上，无论是政党协商还是政协协商，其都有一套成熟的程序设计。然而，要深刻把握政治协商的科学内涵，单从实践层面去认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经验，从理论层面加以认识。

（一）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方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通过政治协商争取民主党派。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中指出：“（我地方党领导机关）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起前进。”^[8]新中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最重要的标志，而取得这一胜利果实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和合作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9]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协商对争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新中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携手建立新中国的共同道路选择。

（二）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重要环节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政治协商在重要决策过程中的作用。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座谈时指出：“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10]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政治协商的统战功能的前提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又强调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使其制度化。1989年4月18日，胡乔木同志在密歇根

大学作题为《中国领导人怎样决策》的学术演讲，指出：“协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程序正在制度化。”^[11]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助力党和国家的决策机制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政治协商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程同其坚持统一战线的历程紧密相连，政治协商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发挥政治协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过程中的独特功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也赋予了政治协商更高的民主价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通过政治协商打破了党争民主的思维定式，逐步形成了“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的新型政党制度特色和优势。以人民政协为平台，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挥了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真正实现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广泛协商，最大限度谋求共识的政治局面。

二、政治协商的内在逻辑

要准确理解把握政治协商的科学内涵，需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重维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政治协商生成、演进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从政治实践到制度安排：政治协商生成的历史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合作和协商，共同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重任。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件指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军阀继续战争^[12]。其后一个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共二大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思想，为推动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13]。

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开展广泛合作和协商的实践起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经历了从“关门主义”到“联合抗日”的转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不管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革命和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协同推进，促进了和平、民主、建国政治共识的形成。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到内战全面爆发，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角力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线的较量，政治协商也成为影响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竞技场。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以最大的诚意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最终赢得了各进步力量的支持。随着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揭开了序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协商取得制度化确认，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商量政府”论断，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了组织平台，也意味着政治协商有了制度载体。此后，政治协商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开展政治协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当然，受历史的局限，当时党内存在对于与民主人士进行合作和协商认识不足的现象，更有不少主张取消人民政协和解散民主党派的观点产生。针对这些现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李维汉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政治协商是一项我国必须长期

坚持和完善的工作。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此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关心和维护下，统一战线的组织得以保留，政治协商工作也得到部分恢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政治协商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有力地推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政治协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明确了“这一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地位。进入21世纪，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政策文件界定了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确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政治协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在制度层面上进行阐释，并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此后，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了全面部署，首次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种协商渠道，政治协商在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从政治建构到文化传统：政治协商演进的理论逻辑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长期实践中“做出来”，具有坚定的原

则性。早在1840年，恩格斯在论述封建宗教势力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的过程中第一次使用了“统一战线”的概念^[14]。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5]。无产阶级不能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在马克思看来，是1871年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过程中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统一战线，而政治协商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民主革命时期，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和灵活运用政治协商这一重要办法，以同时达成求得最广泛的团结面和最大限度分化对立面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政治协商在中国土壤中“生出来”，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政治协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持和功能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协商中“求同存异”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追求“以和为贵”的民族。作为价值理念，“和”就是要求不同的人群之间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其最高层次的境界就在于“和则共生”。这对现代政治协商过程中各党派和各类团体之间平等相处和协商提供了内在的价值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协商制度实践为现代政治协商提供了有力的功能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咨询和协商传统可以回溯至几千年前。”^[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17]政治协商在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

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根基。

政治协商在长期外来文化的冲击中“长出来”，具有充分的包容性。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既是中国人民奋起赶上世界革命潮流的过程，也不能忽视外来文化对既有文明的冲击作用。近代以来，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传入中国，影响了一批批有志于挽救民族危机的仁人志士。晚清以来，“开民权、启民智”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之一，而设置政治咨询机构或建立议会则是实现这一主张的主要办法。然而，由于存在着照搬外国理论和实践之弊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主张将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本土的尝试无不走向失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将外来政治理念进行“中国化”的必要性，其中不乏对协商民主的关注。19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密尔主张，民主协商使政治具有了修正错误的可能性^[18]。承袭这一思想传统，革命先驱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了“中国化”。他主张，中国人民除应享有选举权外，还应拥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即按照公意创订和修改法律的权力^[19]。孙中山的这一政治理念，强调了民主协商对形成公意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

（三）从中国实践到世界意义：政治协商发展的现实逻辑

政治协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前夕，党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20]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必然带来复杂的建设任务和高度社会分工。为了应对挑战，政治协商应进一步拓宽各类协商主体的范围，完善各项协商形式，充分发挥各类专题协商活动的效能，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必要支持。

政治协商是完善我国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迫切

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提出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建设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21]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协商则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方法。迈向新征程，政治协商制度必须进一步发挥其吸纳优势，充分保障各类新兴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利益表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挥这一制度托底作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政治协商是探索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途径。政治协商制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安排。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2]在新中国诞生之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创造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国家建设道路。协商建国的道路，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也超出了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探讨^[23]。这一道路是中国对世界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突破。

三、政治协商的建设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融合”。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推动政治协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可从下列维度进行。

（一）制度建设：推动政治协商制度成熟定型
推动政治协商制度成熟定型是新时代政治协

商工作的中心任务。《条例》是规范协商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是做好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遵循。推进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形成合力。统战部门在政治协商中承担着协调各方与组织力量的重要作用。早在 1950 年 3 月，李维汉同志指出，统战部的职责就是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主动地同党与非党的各个方面建立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与配合，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中，合理“安排人事，调整关系”^[24]。当下，政治协商纳入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大势所趋。第一，协同制定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年度计划。具体来说，在制订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年度计划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和统战部牵头协调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布置协商议题的侧重点，统筹两方面各种类型协商形式的发力方向。第二，协力打造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互联互通的工作机制。在执行年度计划的过程中，对涉及的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协和统战部应该形成合力，例如，开展联合调研、共同规划协商的具体工作，共同提升协商质量。第三，建立健全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长效机制。在我国，各类协商主体主要是兼职参与协商，这是当前工作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为此，应该充分考虑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政协委员等群体的精力配置问题。另外，部分相关工作人员对政治协商缺乏清晰认识，也阻碍了政治协商长效机制的发挥。进入新时代，政治协商的相关实践取得了飞跃发展，许多新概念都伴随而生。这就对部分从事一线统战工作的相关人员的理论认知提出了很大挑战。对此，理论界和从事一线统战工作的相关人员都应该重视对政治协商的研究、宣传等。

（二）主体建设：推进协商主体能力建设

《条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

表人士也是参与政治协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主体建设，需从两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协商能力是政治协商主体建设的关键。要达成这一目标，需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进一步发扬党的政治协商优良传统与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对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25]。全党必须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将其进一步制度化。同时，全党也需重视作风问题，坚决消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政治协商的消极影响，维护新时代党的良好形象。二是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协商意识。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同志指出：“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善于辨别是非。”^[26]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强调抓住“关键少数”的重要性。在政治协商的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对有没有实现“真协商”起决定性影响。正如有地方干部认为，政治协商是否能够有效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再如，不少民主党派成员也表示，党政干部的配合和支持是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保障^①。

另一方面，培养各类协商主体的担当意识和协商能力也是政治协商主体建设的重要工作。如前文所述，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政协委员是政治协商工作中的另一协商主体，其协商能力直接影响协商质量。培养这一类协商主体的担当意识十分关键。有学者指出，政协协商的工作中会出现一些“哑巴委员”“人情委员”“荣誉委员”^[27]。这一类政协委员往往缺乏担当意识，不能够充分履职。有民主党派人士认为，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对党派身份认识不清，开展工作缺乏

注①：来源于 2021 年 9 月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材料。

主动性^①。各类协商主体的能力建设,是有效提升其履职效果的又一环节。新时代以来,社会分化日益专业化,社会分层愈发多元化。这必然导致协商议题的复杂程度不断增长,对协商主体的专业水平和理性思考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例如,有民主党派人士在参与立法协商的过程中表示,当下的立法工作日益专业化,给自己增加了不少负担^②。针对这一问题,培养协商主体的能力是开展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前提。另外,有关部门也应该出台一定的政策,主动减轻各类主体的工作负担,对其参与协商给予适当保障和激励。

(三) 生态建设:创造良好的协商氛围

《条例》明确提出:“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应当鼓励和支持参加协商的各方讲真话、建诤言,加强互动交流,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协商氛围。”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政治协商的生态建设。这一建设工作可以从下列方面着手推进。

第一,重视营造协商空间。履行政治协商职能是各类协商主体的一项庄严使命。对此,有学者指出,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和仪式、象征的植入可以帮助协商参与者完成角色的转换并强化其对协商规则的认知和内化^[28]。论者的观点主要针对基层协商,但政治协商层次更高,所以营造适当的空间对增强仪式感、增进协商规则的内化则更为重要。各级党委要注重为政治协商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如江苏各地普遍设立的协商议事室,既为基层协商创造了专门场所,也为政协委员履职提供了必要空间。同时,协商空间还应注意拓展网络空间。例如,不少地方政协运用网络赋能政协履职,开展“网上履职”“码上议”,搭建指尖的协商平台,突破了政协委员履职的时空局限,极大增强了政协委员履职的参与面、灵活度。

第二,积极创新协商形式。协商形式也是生态建设的主要抓手。《条例》规定了政党协商和政

协协商的主要形式,在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应该灵活运用这些协商形式,努力提升政治协商工作的效能。例如,某省政协的“微建议”实践,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创新政协协商的形式,有效缓解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这一办法突破了书面、约谈或会议等传统协商形式,灵活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了省市县三级联动,使得政协协商的具体议题更“接地气”^[29]。这一实践证明,通过现代技术优化拓展政治协商的媒介、渠道和联络方式是未来创新协商形式、有效提升这一工作效能的主要趋势。

第三,着力培育协商文化。制度运行的文化维度是搭建良好协商氛围的重要命题。西方社会制度主义理论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经典定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符号系统和意义框架,通过模仿性机制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社会实在。”^[30]这一概念对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启示在于:培育良好的协商文化,促进政治协商制度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实践中,不少地方为促进社会“懂协商、善议政”的氛围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江苏省徐州市实行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定点联系基层社区的制度,这既能促进基层协商的规范化,又为基层群众了解政治协商打开了窗口。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学习问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41.
- [2] 董树彬.从“政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理论拓展[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6):39-45.
- [3] 陈宏宇.政治协商:基本内涵和实践探索——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为例的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0):49-55.
- [4]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

注①:来源于2021年9月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材料。

注②:来源于2021年9月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材料。

- 版社, 2011: 401.
- [5] 吴先宁. 中国协商政治百年演进及其发展逻辑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1(1): 58-71.
- [6][23] 闫飞飞. 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 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到实践的创造性再生 [J]. 教学与研究, 2021(7): 78、78.
- [7]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485.
-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十六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50.
- [9][22] 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3、344.
-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四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635.
- [11] 胡乔木传(下)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880.
-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98.
- [1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 11.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30.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455.
- [16] 何包钢. 通往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的新路径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86.
- [1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458.
- [18] 聂智琪, 谈火生. 代表理论: 问题与挑战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62.
- [19] 聂鑫. 代议制的改良与尝试: 中国近代国会制度的探索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49.
- [20]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11-02(1).
- [2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19.
- [24] 李维汉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25-228.
- [25]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52.
- [26] 习仲勋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427-428.
- [27] 蒯正明. 全过程民主视阈下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路径探析 [J]. 学术界, 2021(6): 182.
- [28] 谈火生. 基层协商中的空间维度初探 [J]. 治理研究, 2021(4): 52.
- [29] 谈火生.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 [J]. 治理研究, 2023(5): 35.
- [30] 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M]. 姚伟, 王黎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00.

责任编辑: 鲍跃华

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应然定位、 实然困境与适然路径

于江

摘要:数字将人、物、地理空间连为一体,一场数字化革命已经开始。数字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与互联网、大数据相连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民主样态。从应然层面,准确定位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导思想、学术立场、实践场域等方面;从实然层面,注意规避“数字鸿沟”“数字乌合”“数字异化”“数字霸权”等风险;从适然层面,通过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整合数字技术优势、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构建数字协商制度,探索出一条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正确路径,推进数字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民主;数字技术;数字协商民主

进入21世纪,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5G等数字技术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要求以数字化驱动社会生产生活和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推进数字技术与诸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作为变革生产力的一种新形态,同样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加快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找寻数字协商的适合路径,以此促进政府治理效能全面

提升,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字协商民主”这一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因为数字协商民主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学界对其定义缺少统一的话语,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亦会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民主话语的当代表达。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化时代协商民主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契合而产生的新型民主形式”^[2];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协商民主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产物”^[3];

收稿日期:2023-10-28

作者简介:于江,泰州市委党校政社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

有学者从数字政府建设的视角,提炼了数字化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即“广大公众的表达权、表决权得以更好落实,权力主体事实上有所扩充,权力路径开始呈现多层次、多节点的新特点,个体权益维护更为显著”^[4],这说明数字协商民主不仅包含一般协商民主的特征,也应具备数字赋能的新特质。二是数字协商民主的价值优势。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协商民主形态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满足利益关系调节的现实需要,契合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提升协商民主的实施效果”^[5];有学者从数字中国社会治理精准化的视角,认为“云平台构建了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了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了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6];有学者立足基层民主协商场域,认为“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7]。三是数字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学者们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乡村协商”“社区协商”等实践场域,分层级分领域探讨其实践进路,推动数字协商民主的现代化转型。有学者选取山东省政协数字协商为具体调研对象,指出山东省政协正在着力“打造省市县三级政协一体贯通、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履职平台,推动智慧和力量向云端集结,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8];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数字协商民主的层级,聚焦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协商平台,提出“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9]。

总的来看,部分研究从数字技术赋能的维度探讨了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但忽略了从传统协商民主转向数字协商民主过程中,“应然”与“实然”分立层面的研究;部分研究偏重于理论路径构建,较少把当代中国各层级实践经验总结作为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参照系,导致数字协

商民主的发展尚有难度。笔者认为,理论形成取决于对现象的深入透视,现象产生又与所处场域有着密切关联。从理论上讲,数字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数字技术“向善”,避免技术应用的“异化”,不断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制度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从实践上看,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必须基于中国具体实情,避免脱离具体实情而产生“不适”。因此,十分必要从应然、实然层面将数字协商民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展开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找到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发展之适然路径。

二、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应然定位

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能够促进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凭借数字技术有效整合民意信息的差异,提高协商参与者的民主认知水平,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理性精神。但是,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价值优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原则和指导思想等基础之上,而不能盲目施行,否则极易导致数字赋能失效。

(一) 数字协商民主的根本政治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1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起点必须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必须明确无论是传统协商民主,还是数字协商民主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形成和发展,是党的领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这就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政治领导,确立数字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以提高协商的政治参与度;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思想领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协商民主相结合以

提升党的思想引领；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组织领导，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以提升党的凝聚力。

（二）数字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字中国”的概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数字中国”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1]；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数字经济”等概念，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提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与此同时，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有力推动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以各地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为基础，数字协商民主研究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探索方向，学习运用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协商民主建设。

（三）数字协商民主的学术立场：积极引导技术治理向善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于是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思索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以弥合西方社会的政治撕裂，随后技术治理主义在欧美国家兴起。“20世纪70年代、

80年代，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和公共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基本趋势。”^[12]然而，技术治理却未解决西方治理的难题，同时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对西方既有技术治理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我国，曾有部分学者将西方技术治理主义简单复制运用于国内治理情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治理理论研究的错乱和治理实践的混乱。中国数字协商治理要将技术赋能与民主进步高度统一起来，遵循“多元、民主、法治、平等”等基本价值理念，既不要无限放大技术治理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技术治理的优势。在数字协商民主实践中用“治理向善”推动“技术向善”，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主动利用数字手段解决社会治理难题，为公共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服务，进而追求社会价值创造及社会治理效率提升。

（四）数字协商民主的治理场域：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历史

在西方语境中，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治理范式，旨在矫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制度缺陷和竞争性政治的实践困境。不可否认，无论是治理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皆是在西方社会“生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对成熟。中国协商民主数字化转型刚刚开始，如果没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偏离”。一方面，数字协商民主主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治理境遇大相径庭，开展数字协商民主的条件不尽相同。受限于人口规模与协商空间、主体素养与协商要求、地理空间与协商距离等因素，现实中的协商民主很难实现广泛参与、同时展开、全面推行，即便是在同一个社区（村）的有限空间中也存在很大难度。另一方面，数字协商民主主要结合中国文化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天下为公、重义轻利”“民惟邦本、治国为民”“导民使言、

兼听纳谏”等价值理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成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源头活水。数字协商民主具备了协商民主的一般价值，无论协商民主的形态如何变换，都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历史。

三、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实然困境

“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与它将要成为的事业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任何事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否定的过程中，会向其他事物转化。”^[13]换言之，事物发展进程中往往存在“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张力。数字技术既能发展民主，也能侵蚀民主。数字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在协商民主发展中拉开了一条口子，产生了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鸿沟”导致的资源占有失衡

数字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因资源占有差异而造成的数字技术落差。数字鸿沟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一是从城乡之间来看，据 CNNIC 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农村网民规模达 3.08 亿，占网民整体的 28.9%；城镇网民规模达 7.59 亿，占网民整体的 71.1%”^[14]。农村地区因缺少资金恐很难跟上城市数字建设步伐，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数字协商民主在农村地区较难实现。二是从区域之间来看，东部地区作为先富起来的区域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在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率先实施即是最好证明。三是从社会阶层之间来看，不同社会阶层受限于学历、经验等，掌握数字资源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尤其是部分精英群体具有天然优势，对数字协商民主资源能够直接占有，而部分社会群体较难达到数字协商民主的准入门槛。

（二）“数字乌合”导致的群体极化现象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在某些既定条

件下，聚合在一起，丧失了自觉的个性，从而受群体思想支配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15]。“数字乌合”是数字技术与信息受众共谋之产物，具体是指针对某一热点事件快速聚合，以无组织的理性批判为起点，且极易受到情绪感染的网络群体。与传统社会的“乌合之众”被动接收信息有着明显区别，“数字乌合”已经转变为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生产者”“传播者”，加之协商议题主体由主流精英向多元化转变，易加快“数字乌合”的聚合。与此同时，开放性和互动性的数字技术拓宽了公民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渠道。公民通过数字协商民主平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协商议题大幅度增加。数字时代，协商主体并不缺少进行协商的“议题量”，问题在于对于海量议题的辨别和筛选。如果在利益表达和信息处理时缺乏理性，或者受到非理性表述的煽动，出现谩骂、侮辱、诽谤等行为，集体理性也会遭到消解，极易造成协商民主的失序和失效问题，损害协商民主平等公正的健康氛围。

（三）“数字异化”引发的民主侵蚀困厄

数字异化主要表现为数字时代人之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当前，数字与资本的“联姻”生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的本质仍然是剥削压榨剩余价值。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数字秩序和民主逻辑的重构，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此时，数字技术就成为服务资本主义民主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数字殖民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成瘾性。隐蔽性表现在对用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行数字化运算，形成一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数字程序。如此一来，公众在网络中一切行为都有可能被预知和操控。如 ChatGPT 能获取用户的政治偏好，以“信息茧房”屏蔽异质化观点，让协商主体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数字环境之中。成瘾性表现在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数字用户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天马行空，有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愿景可以

转移到虚拟世界中实现。于是，人便不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数字殖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数字协商民主的重要威胁。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高度警惕西方社会打着“数字协商民主”的幌子实施数字殖民。

（四）“数字霸权”造成的民主话语旁落

一方面，数字平台的扩展存在隐忧。数字协商民主借助智能化平台实现对协商民主全过程的“管理”，但是数字平台并非客观中立。数字平台背后的资本直接影响着平台的算法和规则，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来表达“公众声音”。在数字协商背景下，数字平台通过数字智能和算法推荐直接影响和操控用户的意见和行为，并根据需要对某些热点话题有意识放大某种舆论、掌控舆论走向、把控公众情绪、置顶协商议题。在一些数字平台之中，部分用户几乎没有自主权，只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更不能提出有价值的议题供协商。另一方面，更易引发数字协商主体的心理危机。数字霸权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了对数字主体的奴役，视个人身份为数据，导致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增加；视私人空间为数据，个人位置和行为空间容易暴露在外；视商业交易为数据，商业秘密就此成为可以交易的数据。个人在互联网中虽然可以虚设假身份、创造新人设，但是无法隐藏数据所提供的公共行为中的“真实自我”。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会造成数字协商主体的心理危机，致使数字协商的主体畏惧数字而难以在数字化平台开展协商活动。

四、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适然路径

诚然，数字协商民主的关键，不仅是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是从现实世界到数字世界的全方位全域性变革。数字化进程不仅悄悄改变着协商的主体关系，而且重塑着协商民主制度。当前，需要针对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之后产生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割裂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数字

技术与协商民主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找到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适然路径。

（一）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弥合“数字鸿沟”

第一，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政策和资金供给。基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亟须围绕“新基建”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资金投入，扩大移动宽带和光纤网络的覆盖范围，降低农民互联网使用的门槛，增加农村互联网接入的端口数，积极推进乡村政府数字化标准建设，布局“农业物联网”“智慧物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乡村数字化服务均等化，让乡村政府在数字协商中具备可承接网上协商议事的基本设施条件。第二，促进东中西部数字化协同发力。对东部地区来说，应强化数字技术发展优势，以及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的支持带动作用，继续发挥好数字协商的引领示范作用；对中部地区来说，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数字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平台；对西部地区来说，应尽快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好适宜数字协商民主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三，提升老年人等群体的数字友好度。政府要加强对老年人等群体的人文关怀，保留传统线下服务，提升数字化服务的适用性，尤其是要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用网安全，加强对老年人的信息安全宣传，向老年人普及医疗、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基本防护知识。同时，警惕老年人等群体在跨越数字鸿沟时陷入“数字成瘾”。

（二）整合数字技术优势，突破“数字乌合”

维护数字社会的公共利益客观上要求改变数字协商民主的技术规则，使其更好地适应数字协商民主的新趋势。其一，制定算法规则，增强数字协商的平等性。国家在顶层设计中要制定公平公正的算法规则，保证不同行业职业、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协商主体的不同意见被广泛收集，使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参与协商实践；突破协商议题建

构唯官方主导模式，并避免数字协商民主被算法工具所“绑架”，以规则的力量将数字技术限定在有益的范围内。其二，借助算法技术，提升数字协商的规范性。美国学者巴拉巴西认为，“6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16]。将算法技术融入数字协商的全过程，借助算法技术的逻辑推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完善协商议题，依靠技术对协商议题讨论方向实时监控，提高公众理性思维能力，从而确保数字协商的规范性。例如，数字协商主体持电视遥控器或者智能手机开展协商议题征集、选题投票、协商报名和在线协商，对协商流程以模型呈现，让协商流程更加可视化。其三，优化算法工具，确保协商决策的科学性。数字化决策通过数据模型和算法，可以发现数据中的隐藏规律和趋势，从而提供更准确的分析结果。数字化决策可以减少人为干扰和情感因素，使决策更加基于数据和事实，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三）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扬弃“数字异化”

扬弃数字异化是指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重构数字生产关系和解放数字生产力，意欲消解劳动与收益不相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17]。一是以“人民逻辑”替代“资本逻辑”。防止数字技术异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新技术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家治理各领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数字产品，以保证每一个体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对数字资本的规制。国家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数据安全法”“知识产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数字资源的归属确权，防止数字公司对数字资源的垄断行为，保障公共数据的共享共用，引导非公有制数字公司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服务的发展

方向。三是加快确立数字资产的公有制属性。“数字虚拟交往”作为当代社会交往实践活动的主要形态，并非天然被资本逻辑所支配。数据只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避免数十亿无产者的“自我毁灭”。对于我国而言，亟须制定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的所有权问题，探索数据以国有企业为物质载体平台，以便走出资本的“数字圈地”，确保我国数据资源能够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四）构建数字协商制度，打破“数字霸权”

数字协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秩序，涉及数字政府、数字平台、数字公民和数字团体组织等多元协商主体。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用制度予以保障，系统构建一整套数字协商制度体系。一是数字协商标准规范制度。要结合本地数字化建设实际编写地方标准，针对协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分类化标准，使协商民主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数字协商法治保障制度。在法律制定层面，以法律形式规范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和监管等各环节，确保法律条款的适时更新以及与数字技术创新的匹配度；在法律执行层面，执法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数字协商民主所产生的问题，守法者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不打折扣予以贯彻落实，坚决抵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三是数字协商安全防护制度。数字安全建设已经成为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政府需要从协商议题征集、调查研究、组织协商、跟踪落实、成果转化等方面，构建一体化的分析判断、安全保护、监测评估、监测预警、事件处置功能的数字协商安全防护制度体系，形成终端防护、边界隔离与威胁监测的安全方案，实现协商民主的安全有序推进。

五、余论与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对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两者关系的总体性解释，不能简单应用于对特定案例的描述。面向“数据定义未来”的新时代，可以预见数字技术和协商民主依然会存在一定的张力，两者的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共鸣”和“对冲”。

从共鸣来看,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协商民主实践活动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载体数字化呈现。在未来,政府要引导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以提供更多的便利与现实可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协商民主的发展工具,能够促使政府高效快捷地征集公民的意见,有利于及时并有针对性回应公众。从对冲来看,数字技术会使协商民主更具“未来性”。换言之,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依赖数字技术,多元协商主体皆在智能系统之中,容易加深人民群众对“日常生活”的模糊化。但是,民主是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协商民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具有价值,数字技术赋能不能遮蔽协商民主本质。

据此,对数字协商民主不仅要看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也要看到数字技术未来将会全方位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定位应是服务于日益得到解放的“人”。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无论民主的发展形态如何变换,终归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数字技术为中心。尤其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因此,应持续关注数字赋能协商民主中的适应性和适用性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数字协商民主体系,最大程度发挥数字协商的效用,推动数字协商民主的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8、6.
- [2] 汪波, 安喆.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政府数字协商的实证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64-173.
- [3] 陈家刚. 数字协商民主: 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1): 26-32.
- [4] 罗荣.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价值凸显与方向优化[J]. 领导科学, 2023(1): 141-144.
- [5] 曲秀玲.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协商向度: 优势、问题与优化[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6): 65-70.
- [6] 段治文, 于雯美.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J]. 学习论坛, 2023(4): 78-85.
- [7] 郑永兰, 周其鑫.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 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23(3): 15-23.
- [8] 李剑锐. 奔跑吧, 到云端集结——山东省政协数字“新引擎”实现履职“高质量”[N]. 人民政协报, 2023-07-24(1).
- [9] 邹家峰.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5): 1-9.
-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8.
- [12]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
- [13] 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 王珍,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2.
- [1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3-03).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
- [15]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3.
- [16] 巴拉巴西. 爆发, 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M]. 马慧,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 [17]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79.

责任编辑: 王天海

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工作创新机制研究

祁雪春

摘要: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党委、统战部门不断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机制、培养机制、使用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形成了全链式一体化的工作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高校统战工作的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水平,充分调动了优秀党外代表人士不断参与高校建设、推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

关键词: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机制;民主党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1]。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是知识生产、理论研究、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是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本文通过调研华东、华中地区五所高校,采用结构化与非结构化访谈、座谈等方式,归纳并总结新时代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创新的工作机制,研究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全链式一体化协同机制,以期为推动新时代各高校统战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提供实践案例和经验借鉴。

一、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机制

发现“合适”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前提,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起

点。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发现机制,包括建立领导、计划、联动和储备等机制。一是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领导机制。高校党委把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学校顶层设计的议事日程,校党委常委会每年年初、年中、年末分三次定期听取统战工作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情况汇报,研究和部署重点工作,特别是海外青年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积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大统战工作格局^[2]。通过制定各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案,建立健全重大问题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等一系列统战工作规章,推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祁雪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 2023 年度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研究”(ZK2023022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研究”(22ZT02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动高校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二是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计划机制。高校党委把培养选拔党外后备干部作为学校后备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一部分并纳入党委的日常工作计划。从物色培养对象到选拔使用，建立一个覆盖全流程的良性机制，确保人才选拔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高校党委从基层着力，重点深入院系、实验室，与民主党派开展调研、交流，对全校党外人士的分布情况、研究水平等问题进行调查摸底和梳理分类。从教学、科研、管理一线，在民主党派成员、高层次人才、归国留学人员群体中，物色综合型优秀人才着力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在联系人才、发现人才、凝聚人才方面的作用。健全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和高层次人才信息库，有进有出，有上有下，实行全方位动态管理。三是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联动机制。高校党委、统战部门要深入各个二级学院和教研部门，建立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联系点，积极从党外知识分子、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群体中物色培养党外代表人士，要进一步提高来自基层的党外代表人士比例，确保基层统战工作有重点、有载体、有活力，实现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全方位推进、全领域覆盖、全过程发现，确保基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人数不低于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应在民主党派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既遵循队伍建设的一般性，又要注意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的特殊性。四是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人才储备机制。高校党委、统战部门要合理设计《高校党外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方案》，规范党外干部选拔、培养、举荐、使用流程，制定党外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即重点培养党外领军人物后备干部、民主党派班子后备人选和党外中青年骨干。高校党委、统战部门要统筹人才资源配置，规范推荐程序，实现党内推荐与党外推荐、组织推荐与个人推荐、定期推荐与日常推荐有机

结合，为培养一批同党亲密合作、可堪重用的党外代表人士，为高校组织工作涵养水源。

二、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选拔机制

选拔“可塑”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基础，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重点任务。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选拔机制，包括建立识别、成长、任用和锻炼等机制。一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识别机制。识别机制是确保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功能作用发挥的前提和基础。高校统战部门在同人事部门选拔党外人士过程中，坚持全面的观点，从个人履历、教育背景、文化特长等方面切入，从立体化、发展化的眼光建设队伍，特别是要考虑到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和专业方向，建立梯队化的人才队伍，保持队伍发展的常态化和持续化，实现岗得其人，人适其岗^[3]。二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机制。成长机制是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重要路径。面对多数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培养方向缺乏规划、发展前景不够清晰、组织关怀延迟滞后等问题，应大力优化配置培养资源。针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高校重点联系和培养的院士、教授，国家级、省部级各类人才称号的党外人士，要按照不同级别、不同岗位需求，制定差异化培养目标和具体细则，形成“量身定制”的培育措施。同时，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数据库。在充分掌握岗位人才需求缺口的情况下，适时进行人才队伍的调整补充，实行动态管理台账。三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任用机制。高校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依据中央政策确定全校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方案。在选拔原则上，把握好“三个基本条件”，即党外干部人选的政治素养要强、专业水平要实、综合能力要硬。在选拔程序上，要建立“识别、协商、选举、任命、谈心、任职”的规范化渠道。在选拔渠道上，要主动与民主党派、统战群团各级组织以及地方各

级人大、政协加强沟通与联系,选拔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担任学校中层行政正职,积极参与推荐优秀党外代表人士进入高校领导班子。四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践锻炼机制。根据“参政管理人才”和“议政建言献策人才”两类不同的培养目标,创造多元化的锻炼渠道,注重在实践中培养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一方面,统战部门要主动与组织部门沟通、联系,积极推荐党外有代表性的优秀人才到二级院系或者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的新方法和新举措,加强实践锻炼力度,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包容性发展平台,拓宽选人用人渠道,选拔优秀的党外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任职,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能动作用。

三、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培养机制

培养“可行”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核心,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培养机制,包括建立联合培养、联络培养、联动培养和教育培训等机制。一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联合培养机制。通过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合署办公,围绕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等环节,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党外人才工作,共同制定规划、共同物色选拔、共同培养教育、共同考察人选、共同讨论研究、共同督促检查,做到目标同设、人选共选、责任共担,真正形成合力。二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联络培养机制。党委常委、党委各部室和各基层党委负责人应主动与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各基层党委定期召开党外知识分子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充分调动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热情。建立基层统战工作联络员队伍,实现基层统战委员配备全覆盖,确保工作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三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组织联动机制。高校要进一步完善与基层党组织的联动机制,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上传下达、下报上回的互动效应,

从而把握思想动态、开展相应活动,解决必要诉求等,最大限度发挥高校统战基层组织在凝聚党外知识分子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党外人士参加寒暑假工作会、中层干部会、情况通报会、征求意见座谈会。不仅要鼓励党外代表人士参与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等组织,而且应提议高校党委、组织部门积极向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及各人民团体推荐党外代表人士,参与举荐或安排其担任有关领导职务,如推荐党外代表人士担任政府特邀工作人员。四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教育培训机制。要把对中青年党外代表人士的教育培训纳入统战工作计划,整合校内外政治资源,探索建立符合中青年党外代表人士需求和本校实际的教育培训体系。建立“讲授、考察、调研、交流、反馈”一体化的教育培养体系,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性、科学性和时效性。既要重视党外人才的政治素养建设,也要提高其理论涵养,特别是对于国内外时势的关心关注;要重视党外人才的社会实践,将其自身的专业优势与实践锻炼联系起来,增进其政治觉悟与专业水平^[4]。例如,建立集中培训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外出参观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机制,开展具有前沿性和指导性的教育培训,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学员的参与程度,使党外人士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四、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使用机制

使用“可用”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核心要素,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前提。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使用机制,包括建立联席会议、动态标准、协同使用等机制。一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联席会议机制。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遵循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的“人才战略”方针,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类党外代表人士在高质量发展中的第一资源作用。高校党委、统战部门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部

和统战部联席会议的作用,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和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内容,每学期听取专题汇报,就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结构、规模、人选以及培养、选拔、使用等进行充分沟通、研讨、部署,推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深入开展^[5]。二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动态标准机制。坚持“以用为本”的原则,将人才使用与平台搭建相互融合,既要发挥人才在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又要为人才搭建高水平的智库平台,将优秀人才匹配到合适的岗位,发挥人才技术化、专业化的优势。同时,根据形式变化,及时调整高校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既要关心人才队伍的工作条件,也要关心人才队伍的特长爱好,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党外人才^[6]。特别是统战部门、组织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才发展的前提条件,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人才评价的标准、程序、内容进行调整。三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协同使用机制。做好民主党派成员专业技术职称与行政管理级别的衔接、转换工作,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消除党外代表人士干部队伍使用过程中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在此过程中,多方主体应互相配合、互联互通。党派组织要充分发挥优秀人才使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持与统战部门的常态化沟通;统战部门要做好考察、联系、协调、安排工作;组织部门要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将法规或文件中的章程细则真正落到实处。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科学评定成员对工作的履职情况,并对评定结果实行动态跟踪管理与合理使用,让其成为干部成长晋升的重要依据。

五、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管理机制

统筹“可管”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基本功,也是检验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管理机制,包括建立激励、投入、协同等机制。一是建立高校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激励机制。激励应用于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管理,是指激发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在参与高校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性、能动性、创新性,使其努力完成组织任务,实现组织目标。在物质激励方面,通过科学评价其工作数量与质量,以及工作创新性、工作满意度等,确定绩效考核得分,并基于综合测评结果发放不同档位的津贴、奖金等薪酬。在精神激励方面,加大对高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果、荣誉等宣传力度。尤其是加强对高校党外代表人士参与解决“老、难、堵”技术难题攻关的表彰力度,树立科技榜样。运用自媒体平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科技人才取得的创新成果。将物质和精神激励政策的优势互补,强化综合激励效用,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更好地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提供战略支撑。二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投入机制。高校党委、统战部门要从政策和经费方面落实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投入机制。在政策资源方面,要建立一套体系完备、科学合理、特色鲜明、正向高效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工作建设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包括建立完善的谈话制度、交友制度、考核制度等,强化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教育管理,促使其尽快实现政治成长,发挥其专业才干^[7]。三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协同机制。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协同机制是指根据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具体状况,将针对人才队伍实施的计划、选拔、培育、激励、留任、考评等作为组成要素,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实现各要素间的协同,并使之成为一个高效循环的管理系统。各高校基本构建了统战工作齐抓共管的合作机制,除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外,各基层党委和直属总支等均基本设立统战委员和联络员,协调联动,细化工作部署。此外,尤其要将新形势下高校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相联动,对人才队伍建设做出战略性

规划,既要保证人才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稳定性、有效性,又要确保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与高校整体发展相一致、相协调、相促进。

六、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评价机制

评价“可靠”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对照表,也是检验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标准。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评价机制,包括建立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等机制。一是构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评价目标。瞄准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预期,特别要关注党外青年教师尤其是归国留学人员在适应国情、校情等方面的现实需要,以及被同伴群体关注、认可的情感需求和成长目标。从评价目标着手,以小关怀促进党外人士的大成长,加快促使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逐步成为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社会主义人才^[8]。二是构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评 价内容。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的 重点在于形成涵盖其功能、特征、效果的评价内容。通过结合不同类型人才的岗位性质、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个性特征等因素,相应调整评价要素体系。从搭建大团队大平台,打造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参与大项目,催生大成果等评价内容着手,促使高校党外人才得到快速成长^[9]。三是构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 评价指标。结合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实际工作执行情况,归纳并分类总结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各级指标。通过多维度的细化描述,构建一级指标体系,并层层分解为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二三级指标。同时,考虑不同指标在体系中的权重,以合理区分指标间的重要程度。坚持党内党外同标准、同要求的原则,运用民主评议、述职述廉、年度考核、干部考察等方式做好党外干部的日常管理与考核,及时了解党外人士的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履职能力、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运用程度,推动党外人士

考核评价的规范化、常态化。四是构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 评价方法。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是构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评价体系的重要工具。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评价体系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层面客观、真实地考察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成效。例如,采用访谈法对评价内容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依据,并依据排序分别从多个角度展开评价,为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多项选择。又如,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依据专家意见和评价目标构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成效的多维矩阵,利用一级指标权重测算高校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效果和存在的短板。科学的分析方法既有利于实现对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整体评价,也有利于挖掘高校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亮点和特色,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

七、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考核机制

考核“可信”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验金石,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规范约束。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考核机制,包括建立计划、管理、反馈和运用等机制。一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考核计划机制。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设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中长期考核计划。既要遵循针对统一战线内容制定的基本考核制度,如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实现有法可依;也要明确党外代表人士考核的具体制度,如制定《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考核方案》等,明确权责边界。具体而言,要细化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内容、形式、保障等考核规定,明确考核的范围、人员、内容等,以增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组织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考核管理机制。要明确党外代表人士考核的单位、领导、干部、民主党派的主体机制,建立考核频率、流程规范、成果运用、结果反馈等程序机制。按

照思想政治、教学能力、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划分权重,细化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考核要求^[10]。三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考核反馈机制。通过对考核结果的追踪反馈,溯源考核过程中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实现对考核过程的全链式管理。对于重要的考核结果,开展常态化监督,特别是针对各民主党派组织工作中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以及提交优秀提案能力等方面进行重点监督。通过不断改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内容、结构、方式等,让考核结果真正转化为民主党派的治理效能。四是建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考核运用机制。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要全面对标对表,坚持目标导向,依据考核结果,认真梳理分析组织工作的进展状况,主动前移工作关口,抓紧补齐短板、弥合差距,重点是抓好党外人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将政治思想与工作业绩刚性挂钩,并应用于年度考核评奖评优,职称晋升、职务升迁等,从而确保考核评估责任实、依据硬、数据准^[11]。

八、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保障机制

保障“可堪”的人,是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支撑点,也是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保证。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保障措施和配套机制,对于提高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高校党委、统战部门需不断健全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政策保障、渠道保障、场所保障和人员保障等机制。一是完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政策保障机制。要把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高校年度工作规划,明确建设的目标、任务,确定职责、范围、预期等。同时,积极配合落实统战部门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制度规定。坚持正向激励的措施,在议程、规则、保障、反馈等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上形成制度性安排^[12]。二是完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渠道保障机制。高校统战部门应在观念上重视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的履职实践,行动

上消解体制限制、增加参政议政计划、广开建言献策渠道等,进而保障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的权益。同时,完善党外代表人士的知情明政机制、考察调研机制、工作联系机制以及评价监督机制等。三是完善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场所保障机制。高校统战部门应建有固定的党外人士活动室,主要供党外人士在联谊、培训、交流、学习时使用,提倡一室多用。其中,党外人士活动室标牌悬挂在醒目位置,室内张贴规范细则,一般包括单位内所涉及的民主党派人士组织架构、岗位职责等基本制度;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要设置党外人士决策咨询、参政议政等成果公开栏,公开内容应简单明了。四是完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人员保障机制。高校统战部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增设联络员,加强联系交流。同时,对统战专职干部采取定期集中学习、专题辅导、结对帮带、联席会议等形式,开展培训交流和工作部署。选派高校统战部门和二级院系统战负责人参加针对性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0.
- [2] 杨素群. 新形势下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思考[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5): 94-101.
- [3] 王志立. 完善好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研究[J]. 中州学刊, 2019(11): 17-21.
- [4] 李滨芬. 新时代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路径探析[J]. 黑河学院学报, 2022(6): 44-47.
- [5] 史晓明. 全力推动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N]. 丹东日报, 2017-08-09(4).
- [6] 李光明, 代科学. 人才使用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构成

- 探析 [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5(5): 74-78.
- [7]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 [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43-57.
- [8] 钱再见. 新时代统一战线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聚力高质量发展 [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5): 99-107.
- [9] 林旻, 王炜芳. 关于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的若干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7): 79-83.
- [10] 侯东德, 张灿.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精细化及实践路径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2): 6-19.
- [11] 柯尊韬.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逻辑及实施策略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2): 178-183.
- [12] 吴建明. “大统战”视阈下高校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4): 48-55.

责任编辑: 鲍跃华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网络统战的潜在挑战及其应对

吉 强

摘 要: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演进速度快、赋能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成为事业发展的新变量。就网络统战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际话语权三方面带来新挑战。对此,网络统战要及时掌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状况,了解相关涉网重点群体的特征,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人的工作提供依据;要充分发挥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为“智能向善”发展贡献统战力量;要解决人工智能“本领恐慌”的问题,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进化。

关键词:人工智能; ChatGPT; 意识形态安全; 新就业群体; 国际话语权; 网络统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1]。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展现出强大的生成创造能力,开始涌现出“智慧”,其演进速度之快、赋能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2]。它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推动互联网社会进入智能互联时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可视为事业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新变量。因此,主动预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统一战线的影响,及时应变求变,掌握防范化解风险的主动权,理应是网络统战重点关注的新课题。

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看,网络

统战将会遭遇三方面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传播领域的重大变革,将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各种“以新替旧”,不可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将给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加难度;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放大西方话语,给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造成新障碍。对此,网络统战要实时掌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研判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为智能化时代做好涉网重点群体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要发挥好各类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助力“智能向善”发展;要解决好人工智能“本领恐慌”的问题,积极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进化,进而为生

收稿日期:2023-11-29

作者简介: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四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互联网与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AIGC的传播扩散、公众认知及其社会风险研究”(23A11117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统战力量。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画像

2022年11月,美国OpenAI公司研发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横空出世,迅速获得全球用户的广泛参与和认可,上线2个月便拥有1亿用户^[3],成为一款现象级新应用。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跨时代产品,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全面迈入智能化新时代。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4],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它在收集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预训练、与用户互动,对相关信息进行深度学习,不断尝试“理解”这些信息背后的逻辑及语境等,由此自主生成出新的内容,包括产出具具备常理和特定规则的内容^[5],从而具有类人化的模仿及创造能力。以ChatGPT为例,其基本运作流程是:从互联网以及书籍等处获取人类产生的巨量文本信息,经过“清洗”形成一个“语料库”;然后通过大语言模型的神经网络进行预训练,对语料样本进行学习和“理解”;再在与用户的互动中,不断根据用户的反馈“提示”进一步学习、“理解”并纠错,生成出向用户“对齐”的内容,即满足用户需求,应和用户习惯、观念、情感的内容。这一过程就如同一个真实的人在生产、传播与交流。

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通用人工智能范畴。曾经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的围棋机器人AlphaGo,是只能处理某项具体任务的人工智能,其应用场景单一。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没有明确的应用场景边界,能够跨领域、多模态地处理不同任务,因而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已属于强人工智能范畴。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大模型、大数据和大算力的结合体,即它的发展和运作直接依赖模型、数据和算力三大要素。其中,模型是核心、数据

是支撑、算力是保障。模型层面:结构更加多样,涌现出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Stable Diffusion、DALL-E3等视觉生成模型,以及GPT-4、Emu等多模态模型;参数规模不断扩大,例如,GPT-3的参数规模达到1750亿,而此前的GPT-1参数规模仅有1.17亿^[6]。数据层面:数据质量不断提高,来源更加多样,例如,被广泛用于大模型预训练的The Pile数据集,大多基于学术或专业领域知识,来源包括维基百科、书刊、Reddit链接等20多个数据集^[7];数据规模大,例如,ChatGPT需在巨量数据中进行训练,其语料库可以无限扩充。算力层面:大模型、大数据必然需要大算力与之相匹配,对芯片的性能和数量、云的计算和存储能力要求极高,如ChatGPT使用了上万块内嵌高端芯片的显卡。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目前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在网络化、数字化支撑较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型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也可用于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它能与用户进行真人般的聊天(社交),还能基于用户的需要(指令)自主处理信息收集、文稿撰写、艺术创作、图像处理、程序开发、数据管理及分析、语言翻译等多种任务,因而可以运用在新闻、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养老、金融等众多领域。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接入现有互联网平台(应用软件),将拥有更多的生活应用场景。例如,ChatGPT通过插件系统连接网络应用软件,进而全面渗入人的衣食住行领域,成为用户的智能化生活助手。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信息传播新生态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知识及信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的深刻影响首先体现在传播层面——将重构传播生态,改变内容生产与观念塑造的传播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8]。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高度

契合。新的传播生态将给网络统战工作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巩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带来新的风险。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机”智化传播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新的传播模式或手段，更将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和人类社会知识及信息生产与再生产的“整合器”，进而作为一种“基础设施”重构出新的传播生态——“机”智化传播生态。

从信息生产维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对现成信息进行简单“搬运”，而是基于现成信息生成“类人”的拟真合成数据，是自主化生成内容，它不仅向各类用户提供内容成品，也向各类传播者提供内容生产的素材。因此，它将成为内容生产领域的核心行动者^[9]。从信息循环维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在与用户的互动交流中获取信息，又通过语料库的更新扩容从社会环境中收集信息，再经预训练和“人-机”互动生成新的内容，向外输出。在上述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接入现有各种互联网平台（应用程序），进一步嵌入人类传播活动各领域、各环节，以其检索、分发、“理解”信息的优势，以及类人化内容生成与社交能力，对各种信息进行不断整合，从而逐步成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设施”，最终构建出以人工智能为底层架构，推动信息循环再造的传播新生态。

（二）传播主体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将受冲击

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认知“框架”——“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10]。“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认知的重要凭据，人们借由“框架”理解、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事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经由“框架”的分享而实现^[11]。因此，认知“框架”对人们感知、理解乃至认同某一种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构建认知“框架”，是掌握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主要由“专业生产内容”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民教育单位、大众传媒机构等）构建；在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的构建增加了“用户生产内容”的主体维度，即普通人参与构建；在“机”智化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的构建又新添了人工智能的主体维度，即出现了无生命的内容生产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智能”构建将会趋强：一方面，人对技术的依赖，将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体认知心理的影响，让使用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智能”传递的价值和立场；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用户生产内容”广泛连接，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此类主体构建认知“框架”的取向。简言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这势必对现有的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造成冲击。

（三）传播内容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易被挤压

构建认知“框架”的传播主体发生变化，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会出现传播扩大化趋势，从而进一步争夺用户注意力，不断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

就内容生成过程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具有价值观念多元的倾向，为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便利。从信息收集看，其语料库的样本来自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信息，理论上，不同意识形态内容都会被收集，用于预训练。从预训练看，它依赖模型建构、信息标注以及算法参数等，这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研发人员以及相关人工参与者的价值观印记。同时，在主要由资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资本逻辑、资本的价值立场必然嵌入其中。从“人-机”互动看，它在互动中会根据用户反馈“提示”进行调整，因而再生成的内容会不同程度映射出不同用户的思想观念。此外，从内容真伪来看，它在生成内容时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产生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内容。

就社会信息“整合器”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强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循环再造。一方面，它能够帮助普通用户提升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从而不断增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可见度和渗透力。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与各类用户互动、收集各种社会环境信息，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各种价值观念。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不断循环中，便可得到更强的传播赋能，从而不断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

（四）信息流动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散会遇阻碍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加剧网络传播中“信息茧房”现象的趋势，这会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面的流动性，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范围、深层次扩散。

从微观层面看，个体在获取外界信息时，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不是为了寻求不同声音来“兼听则明”，而是寻求那些能够巩固、支持自己观点、立场的东西。这便出现了“信息茧房”，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12]。与当前“大数据+算法”推送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织“信息茧房”的能力更强：它是基于一对一“互动”直接掌握用户需求，并在与用户交流中不断调整内容输出，直到用户满意为止，这就容易为用户“量身定制”出较为坚固的“信息茧房”。对于不关心、不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用户而言，“人-机”互动的“信息茧房”便成了无形的过滤器、屏蔽罩。

从宏观层面看，在“网络软硬件物理互连”与“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互连”相融合的社会传播网中，无数分散的个体会同类相聚，使得个体化的“信息茧房”按类整合为社会面的群体化“信息茧房”，从而放大“茧房”效应，最终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造成更大范围的阻隔。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产业结构新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新引擎，将进一步放大新技术对经济革新

的驱动作用，引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对就业形势及社会利益关系等造成冲击，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网络统战如何做好人的工作，最大限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而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将面临新的困境。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凸显智能化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倍增作用，使人工智能加速成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关键性生产要素，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快速发展。这包括基础层产业，即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及算力支撑；技术层产业，主要是各类模型和算法的研发和升级；应用层产业，即面向特定场景需求而形成的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13]。目前，百度、360、阿里、腾讯、华为等多家企业宣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做深入布局。据预测，2025年，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规模有望突破2000亿元^[14]。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通用性的潜力，其应用场景可以扩展到各行业各领域，在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管理效率、扩大产品销售等方面，能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华为云盘古制造大模型为生产和供应链计划排产寻找降本增效的最优方案，覆盖研发、生产、供应核心环节，为制造领域生产模式带来革命性变化^[15]。

产业结构智能化升级，即是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以新替旧”过程，必然带来就业层面的突出变化，并使得相关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会给网络统战做好人的工作带来新的困境。

（二）就业形势变化带来的困境：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难度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16]。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就业群体，其多数人具有数字化、网络化生产生活的显著特征，是网络统战的重要工作

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极大改变就业形势,促使新就业群体进一步发生变化,带来新的问题。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引发部分群体失业的风险。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降本增效,将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的失业问题,有研究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全球3亿人的工作岗位^[17]。对于目前的新就业群体而言,其中普通脑力工作者将会受到较大冲击。例如,在线教育、咨询服务、网络营销、广告设计、软件编程、网络写作等领域中,那些从事程式化、高重复性、强规律性、低想象力工作的网络从业者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导致“哑铃型”就业结构——高端就业人群和低端就业人群扩大、中端就业人群收缩。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中涉及模型、数据、算力及应用的研发、生产、服务等岗位会激增,如算法工程师、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等高技能群体规模将扩大。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工作。那些无规律性、低重复性、强创新性、高思想性,需要较强专业技能的工作较难被替代;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人体般的“实体”,因而不能替代部分由人的“体力”所承担的任务,如快递、外卖等终端配送工作。

在上述情形下,网络统战如何把握群体新特征,如何调整工作对象,如何分类施策,等等,都将面临新的困难。

(三)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困境: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压力更重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智能垄断”和“智能鸿沟”,将影响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风险。

一是“智能垄断”易加大群体间利益分化,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大投入、大研发,进入门槛极高,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深度涉入,这使得头部企业及其精英掌握

着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顶层控制权。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嵌入各领域、各行业时,它将演变为整个经济运行的底层设施,处于各种产业链的顶端,易形成由相关企业及群体控制的“智能垄断”。在此情形下,众多个人和中小企业,要么被排斥在“智能”之外,在同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么使用、购买“智能”技术及产品,从而被“智能”及其背后的资本所左右。其间容易出现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科技巨头(资本)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加大、冲突加剧的现象(如“人工智能剥削”“数字隐私”等问题)。

二是“智能鸿沟”易拉大个体间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造成隐患。因个体经济条件、自身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人工智能拥有和使用上存在“智能鸿沟”。具备有利条件的个体,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享受“智能红利”;不具备相关条件的个体,较难适应智能化经济活动,将被排斥在外或被替代,这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和物质获得。同时,教育是人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的运用亦会在个体再教育方面产生鸿沟,进一步扩大个体在智能化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上的差距。

简言之,“智能垄断”与“智能鸿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产生各种新矛盾,这将给网络统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难题。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我国话语国际传播新障碍

借助网络传播和网络社交,发挥海内外统一战线成员及其代表人士的对外传播作用,尤其是推动民间对外交流沟通,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是网络统战的一个重要工作维度。从传播视角看,话语权往往受到技术条件、话语生产、用户认知三个方面的深度影响。目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尚具技术优势,这使得西方国家能够借助“智能”加强其话语再生产,并在“人-机”关系构建中固化西方用户的认知“偏见”,

进而给网络统战提升国际话语权造成新的障碍。

(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强西方话语权的技术支撑

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传播技术在信息跨国流动、交流、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更为关键。这使得传播维度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体现出较强的技术驱动倾向,即话语权竞争首先是建立在传播技术竞争之上,以技术竞争为先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对传播活动的颠覆性影响,将加剧上述现象。一定意义上说,谁具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动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国内互联网及科技巨头加强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以及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快速崛起,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实力提升明显。但客观看,我国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差距。有研究指出,美国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其创造性水平更高,中国企业的创新实力比美国弱^[18]。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技术垄断以及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意图阻断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供应链,在高端芯片等关键性技术上对我国进行“脱钩”,不利于我国缩小与西方的技术代差。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巩固其传播霸权,从而给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带来不利影响。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西方话语的再生产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西方话语在全球循环、放大及强化的助推器。由于西方国家的数字霸权,目前全球互联网传播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国际网络空间中更多的信息生产于西方社会。这就导致西方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虽然能够进行多语种、多地区的信息收集,但其信息更多地源自西方国家的网站及传统媒介,以英语为母语的用户所产生的信息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大量形形色色带有西方观念、立场、利益及叙事逻辑的信息充斥着语料库。同

时,训练中的人工标注等“干预”,以及“人-机”互动中用户反馈“提示”等,又进一步给内容生成与再生成“预设”了西方的价值观。因此,ChatGPT等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应用,将有助于西方话语的全球传播。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战的有力工具。引发、引导舆论是争夺话语权直接而有力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提示”生成符合用户意图的内容,其成本低、速度快、内容逻辑性强、“客观真实性”高,易被人相信和接受。因此,西方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组织或个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高效且隐蔽地设置议题及“话语陷阱”,对外开展舆论攻势,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生产、传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由此增强西方话语的国际渗透力和影响力。

(三) 生成式人工智能扩大西方用户的话语认知偏见

从传播的视角看,话语权离不开承载话语的内容能否传得出去和被怎样认知。前者是指内容能否让用户接触到,并引起他们的关注;后者是指内容能否构建出与说话者意图相对应的认知“框架”,从而影响以及改变用户的观点、立场甚至信念。受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教育环境、媒体宣传、群体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少西方用户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存在认知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互动交流,而不是“计算”或“推测”,直接进入“受众本位”的一对一服务模式,其介入性更强,控制力也更强,更容易培养用户“智能”信息接触的路径依赖,将导致用户不假思索地使用^[19]。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度使用,其预设价值观的输出、对用户偏见性“提示”的应和、编织的“信息茧房”,三者相互作用,不仅固化既有偏见,还会形成新的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高校学生和科研人员使用,这就容易导致“偏见”进一步在西方知识生产流通体系的精英群体中循环,从而会加强“偏见”对中

国话语内容的阻隔以及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解构。

五、网络统战应对挑战的思考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给统一战线带来的风险挑战，网络统战需在把握工作对象新变化、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工作本领三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创新。

(一) 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研判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

从经济层面看，网络统战工作对象与新就业群体交叉重合的现象愈发明显，关注新就业群体，做好团结引领工作，成为网络统战的重要工作维度。技术的演进会催生新产业，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导致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这使得网络统战的工作对象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关注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新特征，是网络统战应对“智能”挑战，做好人的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现状与变化趋势。要深入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的产业化进程，包括基础研发、配套环节、生产生活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同时，要掌握传统领域及当前数字化领域相关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趋势。

二是研判新就业群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下的变化趋势。既要掌握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形成的新职业、新岗位；也要研究在产业智能化中，现有新就业群体，包括代表性人士，其中哪些人会因智能运用障碍而被淘汰，哪些人自身代表性会弱化甚至丧失。由此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群体规模、内部的阶层及类型变化趋势、群体间可能的利益冲突、个体影响力大小等，为调整重点工作对象范围、分层分类把握思想动态、精准化施策、更好发挥作用等提供客观依据。

(二) 固本培元，助力“智能向善”发展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用户协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其中，网络

统战因统一战线涉及面广、人才荟萃等优势，可以在“人-机”协同与共生中充分发挥好人的作用，助力“智能向善”发展，为化“智能”最新变量为事业发展最大增量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加强对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工作对象形成“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普遍共识，树立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权益的价值理念，强化合法合规合理开发或使用的自律意识和防范规避技术风险的责任意识，从而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负责任的技术使用的社会氛围。

二是提升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优质内容供给能力。帮助工作对象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引导他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三俗”内容，主动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充分激发他们文化创造创新活力，促其在线上及线下更多地生产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食粮。鼓励他们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放大中国声音。帮助工作对象提升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能，引导他们通过“人-机”互动加强优质内容的再生产。帮助工作对象提高辨别错误观念、虚假信息的能力，引导他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特长或实际经历开展内容纠错、纠偏，压缩有害信息的传播空间。由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国内外信息循环再生中，不断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尽可能减少或稀释人工智能生成的不良、有害信息。

三是增强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社会动能。引导工作对象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承担应尽社会义务，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引导其中的“智能富人”“智能强人”力所能及地关爱、帮扶存在智能化生存障碍的人群，尽可能化解“智能鸿沟”导致的各种社会风险，帮助更多的人分享“智能红利”，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 克服智能化带来的“本领恐慌”，推动“智能+统战”的进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不懂互联网、不善于运用互联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20]。网络统战具有较强的技术维度，能否充分掌握并运用新技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适应技术的变量性影响，能不能化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因此，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要提前了解、科学认知、主动运用，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升级进化。

一是树立“人-机”协同与共生思维。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跳出专业领域，面向社会普通大众开放，其用户规模快速增长。当它高度社会化普及时，便会出现“人-机”协同生产生活的新常态，形成“人-机”共生的新环境——人与机器同时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参与各种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21]。因此，网络统战需要改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不宜把其仅仅当作处理“人-人”关系的新媒介，即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线上沟通的新载体、联谊交友的新工具、组织起来的新手段，而要把它视为人的协同助手和共生伙伴。

二是推动“智能+统战”的研究与实践。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给统一战线领域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对此，网络统战要加强“智能+统战”的研究，为了解、掌握人工智能技术，预判其变量性影响的新变化新趋势，提供必要理论支撑与知识储备。同时，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新技术，主动创造条件加以运用，在广泛实践、深度实践中增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适应能力，提升与人工智能协同共生并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智能”为网络统战充分赋能。

六、结语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且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但它如同之前的互联网技术，会很快高度社会化并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

产生活。这对统战工作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网络统战应主动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发展前沿，科学预判它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提升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运用能力、对风险挑战的把握能力应对能力，进而确保在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8.
- [2][6][7][15][17] 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工作组. 发展负责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报告及共识文件[EB/OL]. (2023-11-09). https://cn.wicinternet.org/2023-11/09/content_36952741.htm.
- [3] 马占凯. ChatGPT: 人类新纪元[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 148.
- [4]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 (2023-07-1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752.htm.
- [5][13][14] 丁磊.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的逻辑与应用[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35、5、13.
- [8]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1).
- [9] 张微, 彭兰. 示能、转译与黑箱: 智能机器如何颠覆与重建内容生产网络[J]. 新闻与写作, 2022(12): 75.
- [10]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09.
- [11] 肖伟. 论欧文·戈夫曼的框架思想[J]. 国际新闻界, 2010(12): 32.
- [12]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竟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8.
- [1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

- 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
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
迹 [N]. 人民日报, 2022-03-02(1).
- [18] 李红, 陈振英, 朱威. “一流”学科建设形势下决策
情报服务实践与思考——以中美人工智能研究差距分
析为例 [J]. 情报杂志, 2020(5): 73-74.
- [19] 周亭, 蒲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及潜在
治理风险 [J]. 对外传播, 2023(4): 15.
- [2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
标不懈努力 [N]. 人民日报, 2016-10-10(1).
- [21] 彭兰. 从 ChatGPT 透视智能传播与人机关系的全景及
前景 [J]. 新闻大学, 2023(4): 13.

责任编辑: 宋好

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的智慧与启迪

张扬金 李一锟

摘要:廉政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度“秘钥”。纵览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其在不断夯实党员队伍战斗力基础的同时,也为党的事业辉煌和长盛不衰提供了切实保障。党的廉政制度建设蕴含的智慧与启迪有:坚持廉政制度建设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融合;坚持系统谋划作为廉政制度建设的基本方法论;坚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作为廉政制度建设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启迪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党的廉政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是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也是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同特征映照的产物。就其意义而言,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制度“景象”的同时,呈现出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廉政制度建设的方向与规律。基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前提,总结百年来党的廉政制度建设的智慧,不仅有助于回顾历史,而且能为当下及未来廉政制度建设带来诸多启迪。

一、坚持廉政制度建设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融合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1]纵览党的廉政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一方面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创新与发展,这即是坚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机融合的结果。

(一)三大逻辑是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

制度是一种刚性规范,对于人们的行为起显性约束作用,进而保障秩序稳定有效。“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制度有新制度与旧制度之分,经验表明,制度的“新”和“旧”并非一成不变,任何制度的创设往往是以“新”制度面目呈现,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新”

收稿日期:2023-10-19

作者简介:张扬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李一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度会逐步与社会形势不相适应而步入“旧”制度序列，同时新的社会形势又呼唤新的制度出台。如此，制度建设成为制度“保质保鲜”的必要举措。党的廉政制度建设初衷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廉政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开启廉政制度建设的历程，其初衷就是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维护国家政治秩序，推动社会有序发展。

廉政制度建设蕴含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大逻辑。理论逻辑是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制度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制度建设思想指引下开展的。历史逻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演进的结果。从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不仅呈现了不同社会形势下廉政制度建设的特征，也呈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廉政制度建设的方向和规律。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是伴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展开的。回顾这一历程，党的廉政制度建设既吸收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历史传统，又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形势对廉政制度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作为一种历史承袭过程，前阶段的廉政制度建设是后阶段廉政制度建设的源头和基础，后阶段的廉政制度建设又是前阶段廉政制度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在整体上呈现出廉政制度建设的方向与规律。实践逻辑遵循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理论从实践中来，理论又指导实践。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制度建设，是党的百年事业发展进程中实践形势的客观诉求。换句话说，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除有顶层设计之外，还有来自一定时空背景

下现实问题倒逼的实践探索。例如，抗战时期，针对党内存在干部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的倾向，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提防“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4]，以此告诫党员干部要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贯彻到底，同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蚀、萎靡不振的歪风邪气划清界限。

综上所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构成了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三重逻辑相对独立，承载了廉政制度建设的各自角色。理论逻辑承载的是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及指导；历史逻辑承载的是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的方向与规律；实践逻辑承载的是客观形势下党的百年廉政制度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目标导向。另一方面，三重逻辑之间又有机关联。表现为三重逻辑对于党的廉政制度建设作用的同时性，任何时候的廉政制度建设都是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还表现为三重逻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具体说来，理论逻辑是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诠释和指引，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又是理论逻辑的基础。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内在统一性，历史逻辑的呈现是在实践逻辑的周而复始中不断演进，实践逻辑又是在历史逻辑的演进中得以发生。

（二）把握历史逻辑：赓续优秀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历史逻辑在体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表现和特征的同时，又体现出廉政制度建设动态走势，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制度建设的演进规律。对于当下及未来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就是要遵循中国共产党廉政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规律，以这一规律把握建设方向和建设路径。

其一，进入新时代，党以果敢而从容姿态应对廉政制度建设中的问题，总结近现代中外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以全新理念和实践指引廉政制度建设，包括以全局观念统揽廉政制度建设、以法治理念保障廉政制度建设畅通无阻，等等，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等党内法规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强调廉政制度建设要尽快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其二,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独特价值,并揭示其精神实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新的定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将“实现廉政制度建设对清正廉明、公平正直、勤劳为民的基础性培养”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生机的重要内涵。

(三) 把握理论逻辑:契合政党治理的要求

现代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治理水平决定着国家的整体政治面貌和国家治理的成效。任何一个伟大的党,一定有宏大目标和战略眼光,那么也一定会将政党治理摆在突出位置。政党治理的核心意涵就是要加强包括廉政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建设。自古以来,“廉”作为一种高尚的为政品质而为世人所颂,为政者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就是“廉”作为政治本义的最好印证。为官为吏,皆宜清廉正直。由此可见,对政党自身的治理理应包括廉政建设。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廉政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廉政制度建设要达到政党治理的预期目标,必然要求提供相应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5]对于党的廉政制度建设而言,同样需要有廉政制度理论的指引。对此,未来党的廉政制度建设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党治理理论,同时又以政党理论来推动实践。当然,“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未来廉政制度的建设,需要以政党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不同时代的形势,不断推进廉政制度的理论创新。

(四) 把握实践逻辑:立基实践的现实需要

就实践逻辑而言,就是要“注重实践导向,回应现实问题”^[7]。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形势的需要,增强党的战斗力,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管党治党这一诉求更加需要有思想自觉性和治理持续性。从目标层面看,党内成员只有具备了淳朴、勤勉、爱岗敬业、循规守法、明辨是非,才称得上“廉正”,政党肌体方能保持清洁健康。考察党的廉政制度建设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廉政建设之所以从不间断并取得显著成效,关键法宝就是党的领导。从本质上看,腐败源自权力的异化,一旦权力自利性的特质得以扩张,就会滋生腐败。而要实现执政为民的目标,就需持之以恒地加强权力监督制约,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从而夯实廉政建设的政治生态基础。从深层次看,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对腐败治理的方略进行反思,进而实现廉政政治向廉能政治的转变。这一议题涉及廉能观念的政治参与主体、营造清明公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的机制、直观外显的廉政行为。

为此,需要进一步树立廉政建设的“廉洁+效能”导向^[8]。一要重视廉能教育,激励政治参与主体坚持社会公德和公共理性,从而锻造参与主体的政治基础。二要加快权力结构转型和运用方式的变化,尝试以制度保廉,树立政党治理的权威。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建设对廉能的重要支撑作用,实现廉能建设向高效性、系统化方向发展,为政党治理提供良好政治生态。总而言之,廉能建设作为对廉政建设的超越,必须同时兼顾“廉”和“能”。

二、坚持系统谋划作为廉政制度建设的基本方法论

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实效性,是决定工作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便于问题的解决而确保工作方向与预期目标相契合。纵览百年以来党领导的廉政制度建设,始终遵循系统性思维,即将廉政制度看作一个体系,在注重不同具体制度之间关系的同时,还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

要素，以此保障制度的科学性。

（一）系统性思维是科学方法论

系统性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即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依据系统性思维探讨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能深入而又全面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具体说来，在深入性方面，系统性思维以结构性框架将研究对象分成若干层次及构成要素，并注重研究各层次的构成要素之间、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此能使研究者走入研究对象的内在空间，同时探究其内在空间的构成与变化规律。在全面性方面，系统性思维注重各层次要素、各层次与整体系统之间的关系，将其作为影响整体系统变化的重要变量，这些变量的叠加成为影响整体系统运行的综合要素，使研究者能全面探究系统外部运行的结构与规律。

以系统性思维来探究我国廉政制度建设，在厘定制度体系中各层次和要素的基础上，着力分析各层次要素与要素之间、各层次之间、各要素与制度体系之间、各层次与制度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进而能有效探讨维系和促进廉政制度体系运行的规律和方式方法等。基于此，以系统性思维推动廉政制度建设，能够保障廉政制度建设在科学合理的轨道上运行，保障廉政制度高效运行的可持续性。

（二）廉政制度建设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构造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廉政制度建设是具有一定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性构造。首先，廉政制度建设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方面，这使廉政制度建设的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能为廉政制度建设提供方向指引，保障廉政制度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保驾护航。其次，在廉政制度建设的理念上，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战略。文化是软实力，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塑造制度建设主体的正确理念，还可以为制度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因而，需要把握文化建设的

走势和规律，明确正确导向，构筑运行机理，为制度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对此，在廉政制度建设的理念上，关键是要以制度建设责任分工为主线，在述廉、释廉、扬廉的制度体系下同向发力，不断拱卫廉政制度阵地。再次，在廉政制度建设的锻造上，坚持制度规则与制度权威并重的策略。制度规则是刚性的制度文本，能够发挥显性的控制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形象的实质意涵，是制度获得更大认同的关键因素，能为制度控制力提供关键支撑。在实际操作中，立足于可识、可信、可行的基本要点，突出制度的规范性、强调制度的权威性、体现制度的导向性，让党员看有所获、学有所思、行有所得，尽显先进制度的示范导向激励作用。最后，在廉政制度建设的目标上，坚持以充分的效能释放为目标导向。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是有机统一体。制度优势是释放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础，效能释放是彰显制度优势的重要支撑。制度如果不能充分释放出应有的治理效能，那么就很难称得上是好制度。百年以来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健全的廉政制度是被历史证明的好的制度，契合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和现实需要。这意味着，当下及未来廉政制度建设要把效能释放作为重要目标导向，以彰显廉政制度生命力、创造力和可持续性。

（三）以系统性思维推动廉政制度建设

如上所言，廉政制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性制度体系，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影响着廉政制度的建设效能。基于此，以系统性思维推动廉政制度建设显得尤为关键。廉政制度的建设并不仅仅是建立规章制度，还要注重廉政文化建设、廉政制度权威塑造以及廉政制度执行等方面。

具体而言，廉政制度供给需要考虑非正式制度、现有制度安排等各方面影响。不同时空环境下，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在对以往制度建设优良传统继承和拓展的同时，不能忽略制度供给主体对党内法规体系推行制度变迁或创

新的意愿。同时,注重廉政文化建设,保持党内成员思想上的先进性和道德上的纯洁性。作为廉政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廉政文化以先进的廉政理念为引领,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石,以创新的文化教育活动为载体,抵御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达到拒腐防变的目标。此外,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建立健全防腐体系和塑造廉政制度权威的需要。要维护廉政制度的权威,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以落实廉政制度责任制为抓手,强化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查,使党内干部在遵章守制方面率先作出表率,并将廉政制度执行的情况作为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据。按照这样一整套实践逻辑,廉政建设体系就是在时空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度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三、坚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作为廉政制度建设的基本方略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9]这表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是一个新事物不断替代旧事物的过程。廉政制度建设同样需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其直接表现就是廉政制度的效度、价值性和作用力会随着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存在一定的“适用周期”和“生命周期”,即廉政制度本身需要适应廉政建设需求和廉政现实状况的变化。如果廉政制度能够契合廉政建设的现实需求,就能保持足够的廉政建设效度和广度,展现出廉政建设的生命力;相反,如果廉政制度建设不能适应廉政建设现实状况,缺乏内在的适用性和生命力,自然会影响廉政制度的有效实施。纵览党的廉政制度建设历程,遵循廉政建设“动态发展”规律,及时关注廉政建设现实变化,并注重廉政制度建设的“时变、势变、

地变”,做到“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保证廉政制度建设能够做到与时俱进,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始终保持制度的生机和活力。

(一) 制度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

廉政制度建设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深入而渐次跃升的动态发展过程,集中表现为动态的制度发展和静态的制度成果两个方面的统一。这个动态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制度生命周期”发生作用的过程。任何制度不仅有一个自我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还有一个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更换替代的动态过程。廉政制度作为制度集群的重要表现和构成子集,必然也遵循着“制度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规定,这直接表现为因国家治理的实践需要而产生,因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用新的廉政制度代替旧的廉政制度,实现新旧廉政制度的转换。显然,这种“新-旧”廉政制度的产生和衰亡,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过程。这种调整、更新和磨合,既表明廉政制度建设动态发展的特性,又表明廉政制度建设总是在动态系统中转化完成,以保证廉政制度能不断适应廉政治理新的实践要求。

历史和实践表明,“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0]。从根本上说,廉政制度是同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实践发展相适应的产物,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典型的阶段性动态发展特征。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会产生对应该时代特征的廉政制度,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这些廉政制度能够满足和适应应该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样,廉政制度才能够在动态发展中获得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基础。由此可见,廉政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其适用性和改进性。“适用性”就是指廉政制度能够适应所处时代的基本国情和廉政治理的现实需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廉政建设的美好意愿

和价值诉求，最终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进性”则是指廉政制度具有便捷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能够适应党情、国情和民情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适配。唯有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动态发展和动态调整，促使廉政制度与时俱进、行之有效，才能不断彰显廉政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二）根据时势变化推进廉政制度建设

客观上，廉政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需要随着时空环境和外在条件等时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当然，廉政制度建设的这种发展完善总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升华的渐进式过程。

在不同历史阶段，廉政制度实施的难易程度和基础条件并不相同。要保证廉政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实施，需要根据现实要求适时作出回应和调整。这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绝对地、长期地和完全地适应形势要求。换言之，如同其他制度，廉政制度在时空条件变化下呈现出“绝对调整”和“相对适用”的双重特性，表现为廉政建设的规范、要求和内容等不断发生变化，而正在施行的廉政制度相对稳定地维持着原初形态，那么“廉政建设的时势变化”和“廉政制度的相对静止”之间的张力就会逐渐拉大，进而出现廉政制度部分条款不适应现实要求和发展需求的现象，成为过时、滞后甚至阻碍性的“落后制度”。因此，适应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革旧创新，就成了廉政制度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内在动力。

事实上，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既是廉政制度建设的显著优势，也是其保持生命力和适应力的重要保障。这就意味着，廉政制度建设必须根据廉政建设所面临的现实课题作出调整。当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较量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例如，腐败的交易隐蔽化、手段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等。此种形势下，要求用发展观点审视廉政制度建设，针对腐败问题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做到“因事制宜、因时而新”，

使廉政制度始终能够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保证制度反腐的适应性。

（三）顺势而为做好廉政制度的废、改、立

廉政制度具有较强稳定性，在施行过程中不可轻易变更，以保证制度的权威和效力。但廉政制度稳定性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是处于动态发展变化中的稳定。廉政制度建设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生命有效周期”，要延续这一“生命周期”，关键在于根据现实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创新。因此，廉政制度建设要做好“废、改、立”的改革更新工作，按照“保留适应的、废止过时的、修订缺陷的、新立需要的”原则对廉政制度进行全面清查和及时更新。

首先，注重廉政制度的“废旧”，保证廉政制度的先进性。廉政制度建设旨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发展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顺应和满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任务。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些原本适宜和先进的廉政制度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缺陷。鉴于此，廉政制度建设就需要遵循廉政制度更替的客观规律，结合现实需求，将滞后于时代、操作性不强的旧制度废止，保持廉政制度整体的先进性，符合廉政建设的时代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快了党内法规的更新，从整个法规建设的脉络来看，废旧规立新规的工作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亮点颇多。

其次，注重廉政制度的“修缮”，增强廉政制度的有效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旧事物”，并非绝对的过时、腐朽、消极和落后，它还蕴含着契合新的发展条件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可以转化为新的事物，继续发挥其功效和作用。针对这种“旧事物”，应该做的就是“扬新弃旧”，对其进行修缮，剔除落后陈旧的成分。任何时期的廉政制度都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蕴含着腐败治理的积极因素和有益价值，但会因社会发展变化而出现部分“过时”和“失灵”的情况。因此，针对不完善、不健全的廉政制度，要及时“补

漏修复”，不断优化完善。

最后，注重廉政制度的“立新”，提升廉政制度的适应性。腐败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共有的现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也具有多因性、多层次性和交叉性，是历史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和权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会随着各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相应地，作为腐败治理工具的廉政制度，需要根据这些新变化作出调整，即廉政制度的“立新”。这既是廉政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廉政制度建设保持信度和效度的难点。要积极应对新情况和新特征，及时做到有针对性地“立新补漏”。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廉政制度建设真正做到“无禁区、不遗漏、有威慑、全覆盖”，时刻保持着廉政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 北京：外文

出版社，2022：508.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2.

[5] 列宁全集：第六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67.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7][8] 陈朋.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百年探索：三重逻辑的推进 [J]. 南京社会科学，2021(4)：9、9.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0.

[10]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责任编辑：王天海

全面深刻认识并有效维护信息安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安全的重要论述

黄 丽

摘 要:信息安全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围绕信息安全的一系列根本性、系统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作出重要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不仅强调了信息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且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强人才队伍、强化技术支撑等方面提出了重要举措。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安全; 党的领导; 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围绕信息安全的一系列根本性、系统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作出重要阐释,深刻阐明了维护信息安全对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人民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了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维护信息安全,为做好信息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梳理文献发现,近年来研究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安全论述的研究日渐增多,从其时代背景、重要价值和基本内涵等方面作出了分析。客观而言,这些研究对于分析信息安全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但系统性分析尚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一、信息安全: 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包括免受外部威胁、干涉和侵略等传统形式的安全,还包括信息安全、资源安全、合作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新形态的安全。其中,信息安全是指在信息化的时空背景下,一个国家在推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安全状态,包括信息化能力、信息产业保护、信息化体制和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由此可见,信息安全是一个涉及领域广、影响面大的问题。

(一) 信息安全关乎民族复兴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收稿日期:2023-10-28

作者简介:黄丽,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兴迎来光明前景。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艰巨工程,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要付出艰苦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失去安全,民族复兴将成为一句空话。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在国家总体安全观之下,信息安全是一个重要范畴。对民族复兴而言,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要素。正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信息安全问题。2014年2月,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1]。2014年4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信息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对于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2]。在2018年4月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3]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这一大势,站在民族复兴这个高度强调要维护信息安全。这抓住了信息安全这个关系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指出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顺应时代潮流。事实上,信息化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确保发展环境的安全,这正是信息安全问题的深刻背景。

(二) 信息安全关乎国家软实力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4]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还体现在文化、信息等方面的软实力比拼。随着国与国之间信息技术竞争日趋激烈,有效维护信息安全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讲,维护信息安全绝不是信息安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综合实力的重大问题。正是站在这个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信息安全,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奠定稳固基础。

(三) 信息安全关乎国家安全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只要国家一经出现,国家安全的问题就随之产生。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安全具有不同的内涵,也有不同的要求。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波云诡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5]历史和实践证明,国家安全不仅是民族独立的保证,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正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6]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信息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诸多经验教训表明,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缺乏信息安全,国家安全也将失去支撑。正是基于这种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7]

(四) 信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

如果说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

础，那么政治安全则是一个政权最根本的需求。

“政治安全从一般学术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由政权、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政治体系，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面对风险和挑战时能够及时有效防范、应对，从而确保国家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8]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安全，它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意识形态的稳固，被人们视为一个国家和政权最根本的需求。但是，政治安全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不仅涉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灌输、执政绩效的提高，还涉及包括信息安全在内的一些外在因素。任何一个成熟的执政党都会重视信息安全对于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从深层次看，信息安全之所以关乎政治安全，是因为在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政权的巩固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利用得好，信息会成为政治安全的保障；利用得不好，信息会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重视信息安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就蕴含着这个深刻的道理。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信息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信息安全领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9]。这指出了信息安全工作的最根本保障。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维护信息安全的最大可靠力量。当前，我国信息安全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维护信息安全还面临不少阻力。这既体现在公众的信息安全意识比较淡薄，未能充分认识到信息安全对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又体现在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最根本的力量来讲，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论述，在维护信息安全上做到集中统一、

精准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国家安全系统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教育引导国家安全部门和各级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国家安全队伍”^[10]。

三、坚持人民立场，为信息安全注入充足动能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人民立场始终是根基和不变的坚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12]。可以说，我们党自成立伊始就把人民牢牢地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一理念没有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有任何变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曾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13]。

对于信息安全工作而言，真正的铜墙铁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14]。为什么要把维护信息安全的重要力量寄托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就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要想赢得信息安全的主动，就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可以说，维护信息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承担的职责，广大人民群众则是维护信息安全的最大支持力量。信息安全有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会有坚不可摧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

都归属于人民。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汇聚和激发近十四亿人民的磅礴力量。”^[15]“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16]

四、强化技术支撑，为信息安全提供必备条件

信息安全既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又要抓住技术支撑这个必备条件。无数事实证明，过硬的技术支撑是维护信息安全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些国家在维护信息安全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上没有及时跟进，导致技术手段跟不上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技术手段的滞后必将使信息安全失去基础性支撑。

实际上，自古以来技术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早期的密码就是信息安全的一种技术手段。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要素在不断升级。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计算机硬件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信息安全深受关注，“可信的计算机系统安全评价准则”被提出，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维护信息安全过程中的常用准则。1988年的“蠕虫事件”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计算机系统漏洞，以及黑客和病毒问题使计算机犯罪事件频繁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可信的计算机系统安全评价准则”被“信息技术安全评价通用准则”替代。在中国，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技术在信息安全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人们意识到通信保密、计算机数据保护、防火墙、安全路由器、系统脆弱性扫描软件等技术手段对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作用。当前，人们更是清醒地看到，这些相关风险挑战通过各种技术平台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可能引爆重大安全事件。可以说，正是各种信息特别是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使得防范和

化解信息安全风险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5G时代，大数据的作用方式不断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诸多事实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能更快借力信息技术手段，就会在日后的发展中赢得优势和先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例如，201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17]。之所以要重视网络信息技术，是因为“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18]。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19]。

在信息技术这个要素中，基础设施是重要一环。基础设施不牢固，维护信息安全会面临困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要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也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相关规定。

五、做好网络舆情信息工作，为信息安全提供前哨

舆情是观察和分析信息安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通过舆情分析，能了解信息安全的风险点在何处。因此，要重视舆情分析研判工作。同时，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密不可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

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21]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2]。因此，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研判工作极为重要。“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23]特别是要认识到，“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24]。

舆情信息工作不是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近年来，中央各部门积极行动，逐渐形成推动舆情信息工作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国家信息安全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针对云计算与大数据、信息系统保密管理等领域面临的信息安全实际需要，继续组织国家信息安全专项，这从技术层面为加强舆情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2015年，公安部门与互联网管理部门密切合作，就推进互联网安全管理和网络社会法治建设工作推出一系列举措，推进网站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为舆情工作提供必要保障。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其中不少内容与舆情工作相关。例如，在网络生态治理中提出，要“强化网络舆情管理，

对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进行管理”^[25]，特别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26]。此后，工信部等部门相继贯彻落实，从信息网络等方面作出推动和保障。

六、加大人才供给，为信息安全提供源泉活水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事业发展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引用《大雅·文王》中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以强调“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27]。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对于信息安全工作而言，人才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要想筑牢信息安全的坚固堤坝，数量充足、结构优良的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战略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28]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信息安全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信息安全人才成为信息安全领域争夺的焦点。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没有合格的人才队伍是不行的。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信息安全方面的人才缺口很大，这已经成为我国信息安全领域的突出短板。这种人才不仅指信息安全领域管理人才、信息技术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还包括高水平创新团队。这些人

才对信息技术的审核、发布、监管等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培养网信人才,要下大功夫、下大本钱,请优秀的老师,编优秀的教材,招优秀的学生,建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29];在人才评价上,强调要“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不唯资历,突出专业性、创新性、实用性”^[30];在人才激励上,强调要“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才有成就感、获得感。要探索网信领域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机制,在人才入股、技术入股以及税收方面制定专门政策”^[31];在人才流动上,强调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32]。

参考文献:

- [1][4][7][24][28]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N]. 人民日报, 2014-02-28(1)、(1)、(1)、(1)、(1).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EB/OL]. (2014-04-1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
- [3] 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2018-04-21).https://www.gov.cn/xinwen/2018-04/21/content_5284783.htm.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5-56.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9.
- [8] 王灵桂. 政治安全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根本特征 [J]. 国家安全研究, 2022(1): 25.
- [9][10]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8-04-18(1)、(1).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4.
- [12]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39.
- [13]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3.
- [14] 习近平在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 [N]. 人民日报, 2016-04-15(1).
- [15][21][2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67、368、21.
- [16][29][30][31][32]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4-26(2)、(2)、(2)、(2)、(2).
- [17][18][19][2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 [N]. 人民日报, 2016-10-10(1)、(1)、(1)、(1).
- [23]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N]. 人民日报, 2016-02-20(1).
- [25][2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EB/OL].(2016-07-2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27/c_1119291902_3.htm.
- [27]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N]. 人民日报, 2014-06-10(1).

责任编辑: 吉强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述评：回顾、剖析、展望

谭玲姿

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以来,学界展开广泛讨论与深入研究。现有研究确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整体思路,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脉络。本文结合目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整体情况,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主旨,搭建全过程人民民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分层剖析框架,总结现有研究的整体态势,并探讨有待突破之处,思考未来研究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述评;研究展望

“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并达到一定水平。因此,有必要针对已有研究进行阶段性综合述评,为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提供参考。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总体情况回顾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起步较晚,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2019年,在2020年逐渐增多,2021年以来研究成果激增。以“全过程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经过对关键词、研究类型等的精确筛选,得出有效文献3600余篇,其中期刊文章2500余篇、报纸文章900余篇。2019年到2020年,报纸文献占文献总库的比重较大;从2021年开始,文献类型以学术期刊文章为主。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著作有15部,具有代表性的是《全

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人大履职实践的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探析》《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以及由上海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研习基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基地编撰的《虹桥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著作多为论文汇编,或为代表性实例的集中整理和记录分析。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节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整体发展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2019年11月至2021年6月,“全过程民主”研究初步展开。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此后,学界关于“全过程民主”的研究相继出现,

收稿日期:2023-10-09

作者简介:谭玲姿,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聚焦“全过程民主”的内涵、地方实践、社区治理等。2020年12月,《探索与争鸣》期刊首次开设“全过程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圆桌专栏,对“全过程民主”进行深入研究阐释,开启了“全过程民主”第一次研究热潮,之后相关研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全过程民主”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中,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不断完善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这一阶段研究注重探讨“全过程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现实表现。

第二阶段: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不断发展。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过程民主”中加入了“人民”二字,“全过程人民民主”被正式提出,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逐渐形成发展。202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三次提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在政治建设方面做了深刻阐述。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对我国民主建设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出了全面总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进行系统阐述。这一阶段研究数量激增,相关研究集中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质、生成逻辑、核心内容、时代价值、治理效能等方面。同时,出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其他类型民主模式相比较的价值意义、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国贡献等新的研究关注点^[3]。研究视角深入国家治理、民主话语体系构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也有从法治向度探讨权力监督、地方人大立法、人民政协等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制保障。

第三阶段:2022年10月至今,“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高质量提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更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大幅增长,迎来研究高峰期。此阶段的研究侧重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和释能、对比西方民主的超越性优势、中国民主自信与民主形象塑造、新时代新征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路径等方面。此外,研究逐渐偏向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意蕴、内在机理、实践形态等^[4],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讨论边界和理论纵深。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成果的基本现状

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一是深刻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问题,包括理论基础、保障机制、核心要义、发展对策、显著优势等;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中西民主政治对比的角度进行客观分析,展现中国民主的优越性以及批判西式民主的虚假本质;三是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实践性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目前研究尚有不足,有待突破之处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理论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性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丰富了民主的内涵和形式,对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有一定创新,夯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整体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但阐述性和解读性研究偏多,缺乏具有深度的学理思考和理论创新。一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本源研究方面,对经典文本分析不够深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发展创新,蕴含着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文化基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与中华传统典籍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说服力和生命力,但是已有研究对经典文本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界定的研究匮

乏，民主话语缺乏具有统一性和传播性的话语基底。目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理论研究谱系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这不管是对内深入探讨，还是对外传播输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实践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已有研究成果“重文本，轻实践”。在实践方面展开的研究，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但是从整体研究情况来看还是相对较少。一方面，缺乏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及过程性的实证研究，削弱了“全过程”的特点。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发挥好基层组织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作用，如何从基层的个案研究中得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普遍性对策。另一方面，缺少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调查分析和动态追踪研究，缺乏实际数据支撑以及实践方法的运用和探索，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这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可信度有一定影响。

（三）研究领域和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

全过程人民民主亟待在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研究方法中探索出更具科学性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一是缺乏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和相对应的学科研究方法。全过程人民民主学科交叉融合度较低，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行政管理、法学、政党及群众组织等学科领域，来自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方法支撑明显不足，导致研究内容较为相似，缺乏创新性，其他学科领域的参与度不高，研究方法的运用还不够规范和丰富，亟待提高各学科参与相关问题探究的积极性，培养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二是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多存在于政治领域，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问题鲜有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应该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还应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各个领

域中，这样才能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更好体现人民意愿。

（四）研究视野和维度有待进一步拓展

现有研究的视野大多还限于国内，缺乏更开阔的研究视角和更多元的研究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世界意义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还有待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其世界意义，有利于扩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促使中国在国际上掌握更大的民主话语权。同时，中西民主比较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此外，互联网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重塑我们对民主政治的思考，因此，还需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和民主治理融合的研究，这有利于促进民主利益主体的有效联结和民主空间的深层开拓，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分层剖析

综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现有研究的实际情况，从整体研究方向和类型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进行分层剖析和归纳整合，即主要从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三个层面搭建剖析框架，由浅入深地展开具体分析。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描述性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描述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生成、概念内涵与特征优势等基本要义进行学理解剖，基于描述性层面进行系统探讨。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生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生成理路主要集中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的探讨，清晰地汇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及现实保证。第一，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渊源。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政治文明早期形态存在深层链接，根植于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中，是在更高理论层次和实践水平上对人类民主理念和实践的创新发展^[5]。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其蕴含的深层次政治思维和理念溯源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6]，

这一思想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政治观念经历了从“天下”到“人民”的迭代,政治价值内核经历了从“民本”到“民主”的发展,政治体制经历了从“贤能政治”到“党的领导”的演变,最终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现代民主思想^[7]。第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发端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我国人民民主理论、制度与实践的思想根基,揭示了民主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了人民民主自治的制度与实践形态,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8]。另外,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基础之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归属,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 20 世纪建立的新型中国国家民主^[9]。第三,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保证。党的领导的领导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向心力、依法治国的保障力统一而成的现实合力,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承载,只有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才能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加快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10]。

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内涵

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虽然趋于多元化并渐成显学,但却鲜有针对其概念要素而专门展开的研究,有学者表示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定义要素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特征与本质属性,从提供必要概念工具的角度来奠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石^[11]。还有研究从具体的问题域出发,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例如,随着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尝试从“民主过程和民主结果孰轻孰重”这一问题出发,促进民主实质的复归和重塑,为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和完整体系,提供具有逻辑性和理论性的理论内涵^[12]。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征优势

已有研究主要从中西民主的对比中分析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越性。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彻底的人民主体性、治理有效性、制度优越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全局性和稳定性^[13],杜绝了西方式民主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14]。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结构、制度结构与实践结构,作为最新机制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核心导向,以完备的结构谱系充分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和要义^[15]。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释性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解释性研究主要是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等问题,深入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价值和核心要义,充分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性和创造性。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

一是展现中国民主的巨大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中国式民主理论的丰富和独特优势,深化了对民主多元实现模式的认识,创造了真实有效的民主实践形式,升华了中国式民主表达,精炼中国式民主经验等多重时代价值^[16]。二是为不断开拓民主政治发展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南。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符合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型民主形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推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使我们党带领人民跳出了国家治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对于我国在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不断开拓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境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7]。三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了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础的中国政治话语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围绕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谋求民主和利益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也为世界各国自主探索民主政治道路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18]。

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

多数学者认为,民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制度,完整的制度链条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行,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通过强制制度设计不仅能够确保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体现在我国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决策之中,也能揭示人民民主的内在本质与核心,进一步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19]。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缺一不可,才能保障公民全面的民主参与^[20]。民主的重要价值理念是要通过相应制度安排来加以落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和联动性”,都是围绕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构建和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根本政治制度的高效衔接,形成了完整的制度链条^[21]。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战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围绕民主制度保障、运行环境、参与主体、领导核心等方面构建。具体而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行动重点在于确保党的领导主体地位、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加大民主制度的执行力度、健全数字民主的保障机制、提升中国式民主的国际话语权等^[22]。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持续过程,只有做到坚持治理定位,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维系党领导民主发展的自主性;加强智能升级,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体系的适应性,才能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稳定发展^[23]。

(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性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性研究主要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相关要素的关系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技术赋能等问题,试图探寻更为系统深入、更具价值性研究的可能性,以为后继研究指明方向、开辟道路。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学界多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索研究,这些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主要特点、实际效用和实践进路等问题^[24]。例如,有学者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内容,坚持政治制度自信,总结工作成就,提出目标任务,对健全民主制度和提高民主制度化水平提出明确要求,为未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发展方向^[25]。还有学者从民主构成、民主制度、民主路径与目标等方面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创新之处,全过程人民民主构造了以整体性为创新特色的民主构成理论形态,揭示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多元性和系统性,统摄了人民民主实现的诸路径^[26]。

2.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相关要素的关系

一方面,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集中体现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自主开创的,是真正从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出发的真实的民主^[27]。另一方面,研究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其他相关要素的关系。例如,探讨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统一战线工作能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和治理效能,能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施过程中有效处理好党与人民的关系^[28]。再如,协商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可辨识度正是依托于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能够使民主持续性地贯穿群众生活始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鲜明特征的重要体现^[29]。

3.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智能化时代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场景,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量^[30]。数字技术优势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数字技术与全过

程人民民主进行深度融合和双向驱动^[31]。具体而言,通过搭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平台,拓宽民主空间,形成多元的数字化渠道,用大数据方式更大范围了解和获取民意,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32]。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 继续深化理论性研究,统一民主话语表达

继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性研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进行更深层理解和更全面探索。一方面,系统梳理经典文本,深入研究理论渊源。理论研究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际,进一步梳理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民民主的经典文本,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资源,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统一基本概念,整合研究框架,加强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不管是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担当出发,不断深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内涵和整体框架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概念和传播话语,有利于提高中国民主的价值理念在国际范围的传播力度,破除西方在民主话语上的垄断,让世界各国认识到更多元的民主形式和更丰富的民主内涵,更好维护中国民主的良好国际形象。

(二) 不断加强实践性研究,丰富民主治理形式

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能脱离实践,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层面的研究需要一定时间和深刻思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需立足于中国民主治理的实际,强化问题意识,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之道,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优化实施方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在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

研究需扎根和深入基层,多方位开展实地考察和调研活动,对于实际案例应进行全过程动态追踪,注重不同地区不同实践的差异性,尊重案例事实,在各类实地调查与研究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深入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和治理效能。同时,不断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体系和民主评价标准的构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方式和实践标准具体地、现实地落实到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民主治理工作上,以更好实现人民对美好民主政治生活的向往。

(三) 推进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拓宽民主问题关注领域

一方面,推进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探寻更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合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不同学科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研机析理,有助于从整体上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性研究,培育更多新的学术增长点。例如,从哲学学科领域出发,可采用唯物辩证法视域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从历史学学科领域出发,运用该学科中的考据法、比较史学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民主的历史演进,从历史本源探寻民主本质、民主形式以及民主发展的未来趋势。另一方面,需拓宽民主问题的关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民主问题研究。在政治民主方面主要体现于民主政治建设,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民主方面主要体现在均衡经济发展机会和资源,平等参与,公平分配;在文化民主方面主要体现于文化创造要基于人民需求,尊重社会多元的思想潮流。

(四) 拓展研究视野和维度,创造民主研究新局面

进一步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视野和维度。一方面,在空间上要有世界视野和中外比较研究的意识。中国民主经验和民主方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治理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了重要

贡献,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研究成果,还应针对国外关注的相关研究问题进行探讨,加强与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全面性和专业性,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追溯和中西对比中,探寻民主的本质和真谛。另一方面,在时间上要站在历史和发展的维度看问题,秉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研究态度,从历史中借鉴民主经验,同时充分利用时代先进技术发展民主。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应着不同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对民主的新需求和新目标。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应与时俱进,将新兴科技成果应用到民主政治建设中,从数字赋能的视角开展研究,充分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参考文献:

- [1] 韩震. 全过程民主制度保证了中国道路的成功[J]. 社会主义论坛, 2019(12): 12-13.
- [2] 耿召, 上官酒瑞. 政治学“补课”有方 全过程民主发展有根——“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40周年暨全过程民主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 党政论坛, 2021(2): 59-61.
- [3] 张明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9): 31-37.
- [4] 王立胜, 李昊天. 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 毛泽东研究, 2023(3): 4-17.
- [5] 张伟军. 中国新民主政治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价值定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6): 54-64.
- [6] 张明.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4): 86-93.
- [7] 刘九勇.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J]. 政治学研究, 2021(4): 18-26.
- [8] 赵永红. 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J]. 行政论坛, 2022(1): 40-51.
- [9] 秦德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度支撑与实践体系[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5): 19-26.
- [10] 亓光, 张翔. 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实现”: 基本维度、运行机理与基础承载[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3): 1-9.
- [11] 赵谦, 张晓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论[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2): 77-86.
- [12] 樊昊, 于丹, 崔超. 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的比较视角[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3(12): 13-16.
- [13] Yuxuan He. On the Chinese Logic of Whole-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J].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2(5): 25-30.
- [14] 王宗礼, 张翔. 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3): 62-69.
- [15] 张等文, 王嫚.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谱系与显著优势[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28-36.
- [16] 郑敬斌, 陈艺璇.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多维解读[J]. 理论探索, 2023(1): 52-59.
- [17] 焦晓云, 张婷.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J]. 理论导刊, 2023(1): 10-15.
- [18] 王晓丽, 张振卿.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现实样态与价值意蕴[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7-15.
- [19] 李璐, 赵宸斐.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民主的强制度设计及实践操作[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3(1): 1-7.
- [20] 任喜荣. 全过程人民民主: 政治文明进步的中国贡献[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6): 2.
- [21] 王永香, 李忠鹏.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重维度[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1-12.
- [22] 庞金友, 高秀楠. 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J]. 探索, 2023(3): 1-14.
- [23] 李笑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定位、功能与发展战略[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 会科学版), 2023(4): 28-34.
- [24] 郑敬斌, 陈艺璇.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的多维解读 [J]. 理论探索, 2023(1): 52-59.
- [25] 肖立辉. 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阐释与部署要求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6): 48-56.
- [26] 江国华, 方歆然. 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2): 1-10.
- [27] 高莉娟. 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J]. 中国领导科学, 2023(1): 19-23.
- [28] 束赟. 统一战线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位置与作用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3(1): 89-98.
- [29] 杨守涛. 再思协商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特殊地位 [J]. 领导科学, 2023(2): 11-14.
- [30] 秦国民, 杜奕兵. 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动因及其表现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7): 40-46.
- [31] Songyan Han.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Digital Ag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C]. Paris: Atlantis Press, 2022: 1078-1084.
- [32] 赵勇. 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分析 [J]. 探索与争鸣, 2022(4): 23-25.

责任编辑: 鲍跃华

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以陕西为例

王晓芸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升级的灵魂,乡村旅游是传承发展农耕文化的载体,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是推进陕西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要破解当前陕西乡村文旅融合中存在的问题有待明确、发展模式有待创新和发展生态有待完善等难题,就要进一步创新思路,以智慧化、品牌化和村民主体化等方式,谋划乡村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强基。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重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传承优秀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迫切需要;发展乡村旅游是统筹城乡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增长点。乡村旅游与优秀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既可以为优秀农耕文化提供发展载体和物质支持,也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引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陕西是农业大省,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且辉煌灿烂。将陕西优秀农耕文化植入乡村旅游,

打造农耕文化旅游知名品牌,符合新时代文旅融合的大趋势,对于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意义

农耕文化是指通过农耕生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与农业社会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乡村旅游是指以具有乡村特征的旅游吸引物,依托农村区域景观进行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的旅游方式^[2]。乡村旅游与优秀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对于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优秀农耕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落地生效等均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一) 乡村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升级的灵魂

现代旅游发展中,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现代旅游中的文化色彩越来越浓,文

收稿日期:2023-10-30

作者简介:王晓芸,西安市委党校(西安社会主义学院)文化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传播。

化对旅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首先,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内容。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是农耕文化资源。其中,乡村生活方式、乡村特色食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本身就具有文化属性,而自然风光等乡村景观在开发中也往往以人的文化背景、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来观赏、体验和解读,因此也具有文化属性而成为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核心。文化竞争是超越价格竞争、质量竞争的最高层次的竞争。农耕文化以其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满足了游客“看得见山,看得见水,望得见乡愁”的心理诉求,赋予了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不同的独特竞争力。最后,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游客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层次的提升,乡村旅游已无法再停留在农家饭、游山玩水等单一且较低层级旅游形式,而必须根据游客文化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开发具有相当文化含量与品位的旅游产品,以优秀农耕文化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二) 乡村旅游是传承发展乡村农耕文化的载体

乡村旅游为传承发展农耕文化提供载体。首先,乡村旅游是农耕文化资源开发的有效方式,有助于实现农耕文化资源价值和推动农耕文化“产业化”发展。例如,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文化吸引力的文化遗产资源,拥有“东方人类古代传统文明居住村寨的活化石”“世界民居之瑰宝”等美誉,2019年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近年来通过旅游开发已经成为高价值回报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其次,乡村旅游对农耕文化有传播作用,可以拓宽农耕文化传播的市场空间,让游客体验乡土风情,感受传统生活方式,让活态的农耕文明传播开来。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这种传播方式通过旅游者

亲身感受和体验而实现,因此更加直接、深刻和持久。最后,乡村旅游对农耕文化有保护作用。一个地区要想保持旅游资源的长期吸引力,必然要重视文化保护。现代乡村旅游对农事活动、风俗礼仪、乡村美食等传统农耕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应用,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对农耕文化的保护、赋能和创新,不但使不少濒临绝迹的民间工艺品、传统曲艺、民风民俗等得到重新挖掘和整理,而且提高了民众对农耕文化的保护意识。

(三) 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推进陕西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可作用于上述五个方面,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动能。第一,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具有市场开发价值,有利于三产融合发展和延伸农业产业链,从而使相关产业向主题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举措。第二,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有助于保护乡村传统村落、传统民居、乡村文化遗迹和乡村自然生态,使乡村景观不再是一种自然背景的存在,而是被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价值空间,因而是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推力。第三,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使乡村文化呈现新的时代价值和内涵品味。例如,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的陕西华阴老腔,正是由于旅游业的兴起而复活,进而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这激发了年轻人学习、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热情,有助于发展乡风文明。第四,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通过现代乡村旅游项目向村民传递了文化保护、道德法治、职业素养等理念,有助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五,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两者的正向循环可明显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村民就业,不仅富了村民脑袋,还富了村民口袋,能够有效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因此，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是推进陕西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能。例如，陕西袁家村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农耕文化的价值，通过探索创新乡村旅游运营与管理模式，复原关中传统老建筑、老作坊、老物件等文化遗产，打造景村一体关中印象体验地，在其中经营粉汤羊血、蘸水面、豆腐脑等传统关中美食等方式，成功发展了乡村文化旅游，其乡村振兴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陕西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态势明显，已培育出一批叫响全国的乡村文旅品牌。例如，袁家村、茯茶镇、马嵬驿、青木川等品牌，均具有衍生产品多、游客规模大、品牌认可度高等优势。但是从整体来看，陕西乡村文化旅游依然还存在诸多现实难题。

（一）缺乏明确的融合发展主题

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要主题先行，深入挖掘和表达农耕文化内涵，提升乡村旅游层次。农耕文化按照形态划分，可以分为物质形态、制度形态、行为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四类农耕文化。现如今，陕西乡村旅游对农耕文化的挖掘利用主要停留在最表层的物质形态农耕文化层面，而对制度形态、行为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农耕文化层面挖掘不够，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层次。例如，当前乡村旅游主要对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村古建、小吃美食、民宿酒店和山水生态资源等进行开发，但是对较深层次的乡规民约、民俗信仰、农事活动、乡村美学等文化内涵缺少有效挖掘，有的甚至融入过多现代元素，破坏了古老传统的农耕文化体验，导致较低的开发层次难以满足游客较高的文化心理需求，影响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和吸引力。

（二）缺乏创新的融合发展模式

当前，陕西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存在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由于缺

少规范、标准的开发模式而致使农耕文化的旅游开发质量较低、创意不足。当前，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农业观光旅游模式，即游客欣赏乡村美丽的田园风光、观看农业生产劳作场面等为主的旅游模式。二是民俗文化旅游模式，即游客感受乡村的特色民居、风俗礼仪、村史乡情等为主的旅游模式。三是乡村体验旅游模式，即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种农家地、摘农家果等为主的旅游模式。四是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展示旅游模式，即游客参观农产品博览会、农产品展销会等旅游模式。这些模式运作简单，易于模仿，容易被替代。

（三）缺乏完善的融合发展生态

目前，陕西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存在结构单一和配套不足等问题。一是乡村文化旅游产品供给质量不佳，缺少传统农耕文化的创意和科技融合。对于乡村文旅产业而言，创意和科技处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知识密集、渗透性强、附加值高等特点。一方面，催生了大批新型文旅产业组织，使其借着线上媒体营销宣传的东风一举打响；另一方面，显著提升了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性，激活了农耕文化的生命力。创意和科技融合不足，将影响乡村旅游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二是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不完善、产业附加值较低，导致出现消耗大量农耕文化资源、各项成本较高但市场成效甚微的行业发展困境。例如，秦岭山下一些农家乐改建民宿，由于缺乏相关配套设施和内容丰富的产品体系，而且破坏了乡村原有的自然和谐，导致不但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而且反而会制约乡村旅游的发展。三是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圈形成不充分。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需要餐饮、住宿、交通、景区、商业、娱乐、研学等产业生态圈内多个产业的高效联动和彼此支撑，否则会影

（四）缺乏充足的融合发展人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

合发展的关键也在于人才。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大量乡村年轻人进入城市,老人和妇女儿童留在乡村,导致乡村文化旅游行业中文化创意型、高新技术型、管理型、产业经营型等人才稀缺。因此,当前在乡村从事文化旅游行业的人员大多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由于他们缺乏专业培训,对农耕文化旅游的认知和经验不足,对农耕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市场营销、文化挖掘等缺乏了解,影响了乡村旅游和农耕文化融合的力度和宽度。此外,支持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外来专业人才也相对匮乏,虽然乡村文化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被业内广泛看好,但受制于目前乡村整体发展的软硬件条件和生活条件,富有相关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专业文化旅游人才很难主动进入乡村。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新时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健康、安全、生态等旅游要素的更加关注和对文化体验、乡村康养、田园旅居等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融合优秀农耕文化的乡村旅游势必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以智慧化推动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

智慧旅游环境下,要充分利用现代智慧技术保护、开发和传播优秀农耕文化。一要利用智慧科技加强对农耕文化的保护。研究表明,眼下我们可以看到名字的古代农业著作有 600 多部,可以读到原著的也多达 300 多部^[3]。陕西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区域,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开展农耕文化资源普查,对农耕文化建立保护档案和数据库,建立农业数字博物馆,鼓励相关数字技术的研究和交流,以使农耕文化薪火相传。二要利用智慧科技加强对农耕文化的开发。要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资源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美学价值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

5G、虚拟现实等技术对传统农耕文化进行时尚化包装、科技化赋能和娱乐化演绎,推动智慧文旅产品的更新和丰富,通过对农耕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增强乡村文化旅游的新鲜性、趣味性和互动性,提升乡村文旅项目吸引力和影响力。三要利用智慧科技加强对农耕文化的传播。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耕文化+智慧科技”,研发富有地域特色的智慧农耕文化旅游平台,通过开展农耕文化旅游项目和产品的品类聚集、精准传播和在线营销,打通线上和线下,使其融入年轻一代的社交、消费和娱乐生活场景。同时,在线收集游客的反馈评价,动态调整相关服务方案,提供个性化定制模式,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舒适度。

(二)以品牌化推动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

建设优质农耕文化旅游品牌是陕西传统农耕文化内涵与现代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一要找准文化定位。要立足不同地区农耕文化的地域优势、特色理念,促进当地农耕文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广融合、真融合,精心培育市场识别度高、口碑好、影响力大、难以复制的农耕文化旅游品牌。二要突出品牌意识。要提炼专有的品牌符号,讲好历久弥新、充满智慧、引人入胜的农耕文化故事,建设和维护好农耕文化旅游品牌。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在线文旅经济,引导乡村文旅企业开展当下最火的网络社交媒体直播带货。通过直播推介,一方面为乡村文旅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宣传、展示和售卖平台;另一方面繁荣传统农耕文化,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提振实现乡村振兴的信心。三要做大品牌,扩大市场。要顺应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发展趋势,将旅游业六大传统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向个性化、标准化、特色化的方向升级,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品供给,让乡村旅游变得更丰富多彩和有魅力。例如,在培育农业景观参观体验旅游品牌时,可以通过将其打造成著名的摄影基地、

赛事活动基地、影视剧拍摄基地等扩大其品牌影响力。在培育农业生活体验旅游品牌时,可将特色民俗、美食餐饮、休闲度假融入其中进行系统设计。在培育农业生产技术体验旅游品牌时,可以将仪式庆典、研学活动、动植物认养等贯穿其中,建设高品质、内涵化、整合性的农耕文化旅游品牌。

(三) 以村民主体化推动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

在乡村旅游中,乡村基层政府、游客、旅游经营管理人员及当地村民构成四大主体。其中,乡村基层政府积极参与旅游规划,是乡村旅游的引领推动者;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直接与游客打交道,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游客是乡村旅游的聚焦群体,受关注度最高;而当地村民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实际上,当地村民是农耕文化开发与保护的重要主体。乡村旅游对乡土民俗文化、乡土地域特征的强烈依附关系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4]。只有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出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在推动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时要注重培育乡土人才,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一要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以乡情为纽带、以产业为依托、以政策为保障,厚植乡村引才、留才、用才的沃土,构建村民权益与农耕文化旅游收益的协调分配机制,使农耕旅游项目发展成为富民、惠民的新途

径。二要提升村民的职业素质。要立足乡村的致富能人、种养大户、能工巧匠、优秀毕业生等人才选拔和培养“乡村文化带头人”,带动当地村民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引入专业师资,开展村民法律意识、文化素养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塑造原场景、原模样、原生态的“三原”农耕文化体验氛围,助力传统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与保护开发。三要以乡村文化旅游为抓手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在吸引年轻村民返乡工作和发挥年老村民余热的基础上,丰富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体系,扩大和完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圈。例如,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关中忙罢艺术节”用艺术唤醒乡愁,拓展了城乡文化相互成就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唐海燕. 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产业化发展思考 [J]. 黑龙江科学, 2017(16): 154-155.
- [2] 庞艳华.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11): 315-320.
- [3] 刘奇. 传统农耕文化遭遇断崖式沉没“为往圣继绝学”成当务之急 [J]. 中国发展观察, 2018(24): 62-63.
- [4] 胡秋媛, 陈焕雄. 试论乡村旅游中文化保护: 以江西婺源为例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4): 94-97.

责任编辑: 宋好

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 存在的问题及破解路径

——以 N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张 松

摘 要:基于 N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发现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信息管理不对称性、认知差异突出、化解矛盾的常态化机制不够完善、交流交融的社会供给力度不够、社会公共服务保障覆盖面窄。对此,可以通过构建四大体系,提升少数民族用工的服务管理质效:共建共享的组织体系,构建通力协作的工作机制;共建共治的管理体系,夯实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石;共富共享的服务体系,满足少数民族员工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共生共融的交往体系,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格局。

关键词: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

少数民族人员到内陆或沿海地区务工不仅是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举措。N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外向型经济和科技创新园区,企业集聚度高,用工需求大,招聘少数民族人员已经成为缓解用工难题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少数民族用工数量呈现上升态势。为了进一步强化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切实把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治理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对辖区企业少数民族用工情况开展“全样本”调查和实地走访调研,在了解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现状

特点的基础上,探析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存在的困境与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现状

2022 年以来,N 市开发园区企业先后从伊犁、喀什、和田等地累计招用新疆籍员工 900 余名,其中,维吾尔族占绝大多数。除 LG 新港是面向社会招聘女工外,其余均是从伊犁丝路学院以及叶城、莎车、塔城等当地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的在校实习生。在被调查的企业中,46.00% 的企业少数民族人员用工占比在 5.00% 以下,38.00% 的企业少数民族人员用工占比在 5.00% 至 15.00% 之间。针对企业招收少数民族员工较多的情况,开

收稿日期:2023-10-11

作者简介:张松,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技师。

发园区成立了工作专班，在民宗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推动闭环管理和人文关怀。

(一)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企业招聘前必须向公安机关报备审批，纳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重要内容。大部分企业都建立了少数民族用工管理制度；53.00%的企业建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和专职管理人员，加强对少数民族员工的日常管理，同时，有53.85%的企业与经开区党工委、相关部门建立少数民族员工月度情况跟踪调研机制，通过政企沟通渠道，及时反映企业在管理中遇到的难题。

(二) 落实集中管理。N市开发园区大部分少数民族员工是来自新疆中等职业学校的实习生，辖区企业将“有用工规范、有人员政审、有50:1带队干部、有安全住宿环境、有固定学习场所”作为基础性条件，严格集中外出、请销假等制度。专门聘请清真厨师，开辟清真窗口，尊重饮食习惯。有62.00%的企业表示已经设立或正在建设清真餐厅等少数民族专属用餐区。

(三) 加强文化融合。坚持一视同仁，实现同工同酬。调查显示，92.00%的企业表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工作时间方面基本持平，93.00%的企业表示在同等职位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员工收入基本持平，个别企业薪酬待遇略向少数民族员工倾斜。鼓励新疆籍员工与汉族员工交朋友，组织他们参加团建活动、外出游玩本地景点，让他们积极融入企业管理、了解内地、适应环境。图1显示了开发园区组织少数民族员工开展活动的主要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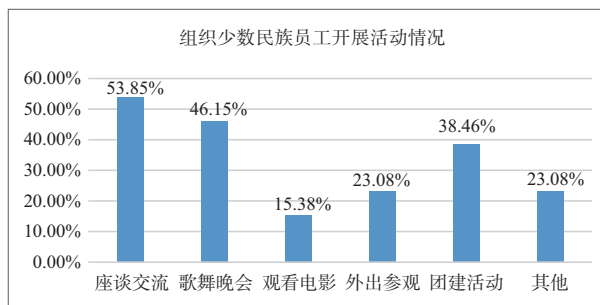


图1 开发园区组织少数民族员工开展活动的主要情况

(四) 重视思想引导。除业务技能和安全法规外，该市开发园区和辖区企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员工开展本地区文化、语言和党的民族政策培训教育。有些企业在厂区内建立起专门培训场地、聘用专业培训老师，使用政府部门统一配发的语言教材。有些企业将语言提升、政策法规学习情况纳入优秀员工评比范围。有些企业积极配合新疆驻苏工作组开展看望慰问、座谈交流、党史教育等活动。园区片区民警定期到企业了解思想情况，指导做好管理服务工作。

(五) 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企业负责人定期通过主动谈话、召开座谈会、与代表交流等方式了解少数民族员工的诉求，84.62%的企业表示能主动开展谈话谈心工作，配合公安、人社、统战等部门形成合力，积极化解企业与少数民族员工的矛盾纠纷。图2显示开发园区及企业处理与少数民族员工矛盾的主要途径。成立“石榴籽工作室”，真心为新疆籍员工服务排忧解难。例如，2022年10月，仕达利恩一批员工刚到园区就遇到因限电造成的宿舍停电，相关部门及时协调，使得停电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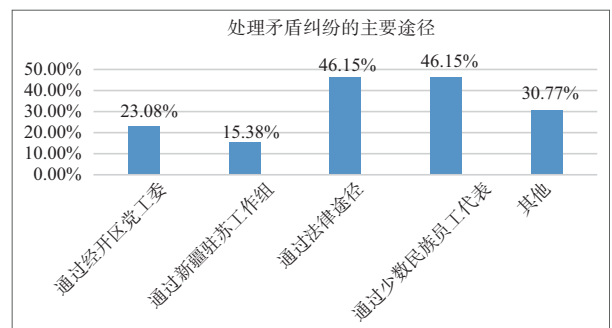


图2 开发园区处理与少数民族员工矛盾的主要途径

二、开发园区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的突出问题与风险隐患

(一) 信息管理存在不对称性。从调研情况看，少数民族用工来源的前三位是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推介 (76.92%)、本企业或其他企业的员工介绍 (69.23%)、人才市场招聘 (53.85%)，而通过新疆等当地政府及劳动部门推介的仅占30.00%

左右。由于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来源的不确定性，导致经开区党工委和企业对少数民族员工的信息掌握不够充分清晰。一是信息搜集困难。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存在的语言不通、沟通不畅等情况，使得企业管理人员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在人员基础信息掌握上存在出入。61.00%的企业负责人或管理人员表示完全不了解少数民族员工使用的语言，仅15.00%的表示会说一点点。二是信息动态更新困难。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流动性大，信息变化很快，信息统计跟不上流动性要求。例如，2022年以来，LG新港通过第三方公司面向新疆社会面灵活用工74人，其中，自动离职就达33人，当天来当天走的有6人，工作时长少于一周的达15人。员工频繁流动导致企业管理信息更新不及时，情况掌握不透彻。三是共享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没有健全的信息沟通合作机制，在人口信息核实、流动人员对接等方面存在障碍。一般而言，政府组织招工用工时需要配备少数民族干部作为管理人员与企业配合统一管理少数民族员工。同时，企业与本地政府或者民宗、人社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一些情况仅靠园区或企业的力量很难掌握。

（二）认知差异突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员工来自边疆，边境性、民族性、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少数民族员工与当地社会发展认知存在一定偏差。这种认知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心理疏离感强。受语言水平、自身技能等限制，新疆籍员工大多身处一线生产岗位上，很难进入管理层。部分企业缺乏对新疆籍员工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导致新疆籍员工返乡多、续留少。这种留人机制的缺乏使得新疆籍员工呈现流动性较强的特征，还加剧了他们的心理疏离感。二是身份认识偏差。由于少数民族员工与当地人员缺乏经常性的交流交往，日常联系也不够紧密，城市居民难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容易造成交往障碍。三是社会认知偏差。部分少数民

族员工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市场观念淡薄，对国家民族政策理解片面，不理解当地的社会管理与市场运行规则，导致社会治理困难。调查中，对于少数民族员工与企业矛盾纠纷的类型，分别有30.00%和31.00%的管理者归类为风俗习惯性的纠纷和宗教信仰类的纠纷，这也表明认知偏差已成为引发矛盾的重要潜在因素。

（三）化解矛盾的常态化机制不够完善。一是化解矛盾的机制没有全覆盖。调研表明，有近60.00%的企业已经建立少数民族员工矛盾纠纷和应急处理机制，并且较好地处理了一些矛盾纠纷。但仍有近40.00%的企业表示矛盾化解的常态化机制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二是矛盾化解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有些管理人员，在涉及少数民族员工矛盾冲突时，不愿依法处置，增加管理的难度。在建立的矛盾化解渠道中，50.00%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人物进行调解，40.15%的企业是依靠法律途径，其余的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解决。三是化解矛盾的底线思维不够。部分负责人对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满足于不冲突、不出事，没有建立起底线思维。事实上，一些重大的涉及民族的事件往往都是由小事引发的。

（四）交流交融的社会供给力度不够。少数民族从新疆等边疆地区来N市务工，以本族、本地人员交往为主，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社会交往圈子，跟城市居民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及信息不对称。特别是由于统战、民宗工作力量薄弱，加上开发园区以企业为主，居民区和社会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少，公共服务不充分，民族间的文化交融缺乏社会性的供给，通过社会大环境在文化认知层面来消除误解、增进共识存在掣肘。

（五）社会公共服务保障覆盖面窄。调研发现，对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有时还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误区。例如，缺少语言、文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正常的宗教生活空间还不够，餐饮、住宿等条件略显不足，子女入学、文化活动、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权益保障还不够充分。

三、优化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探索构建四大体系，提升少数民族用工的服务管理质效。

（一）共建共享的组织体系：构建通力协作的工作机制

少数民族员工的服务管理问题不仅是管理层面的问题，更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性问题；不仅是统战部和民宗部门的职责，也是开发园区其他相关部门的责任。一是建立完善领导协调机制。2020年，该市经开区党工委明确了统战部门职能后，才由宣传与统战部门推动开展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下一步，建立起以统战（民宗）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公安、应急、人社等）相互配合的少数民族用工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和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牵头抓总作用，明确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建立“信息共享、秩序共管、教育共抓、服务共担、联合执法、联合调研”的机制，形成畅通的指挥协调体系，定期召集相关部门通报信息、研究处置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特别是加强与网信办、公安部门合作。把民族工作纳入园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压紧压实开发园区各部门的工作责任。二是建立完善对接协作机制。与新疆喀什等少数民族员工流出地建立“信息互通、干部互派、经贸互促，共同开展宣传教育、共同做好维稳工作”的对接机制。可以借助省、市东西部协作的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新疆驻苏干部掌握人员信息的优势，加强关爱帮扶、化解矛盾。三是建立完善力量整合机制。要充分借助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伊斯兰教协会等组织的力量，开展文化交流、互相帮助等各种形式的活动，通过他们做好宣传教育等工作，使服务管理更为顺畅。

（二）共建共治的管理体系：夯实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石

一要继续强化信息管理。摸清底数是实行管理的基础。要完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流出地和流

入地协同共管的信息反馈与共享网络。调查显示，31.00%的务工人员是由新疆等流出地政府或劳动部门组织推介，以这些人员为基础，联手人社、公安等部门，依托N市社会综合管理与服务数字化信息平台，建立起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基础数据库。考虑到70.00%左右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是通过人力资源公司、企业自身招聘，可以将上述数据库开放端口，及时更新、共享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基本信息。借助大数据技术，利用数据库数据，加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特点分析和现状研判，及时发布重点人员和重大事件相关信息。二要坚持依法依规管理。调查显示，46.00%的企业在面对矛盾冲突时都充分利用了法律武器，在这一过程中，80.00%的矛盾都得到了较好解决。要让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和执法机构打交道过程中亲身感受程序正义，进而增加其对法律的信任和信心，增强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三是积极推广柔性管理。在坚持法律法规政策底线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异乡的“不安全感”，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性化。调查表明，84.00%的诉求是通过企业负责人谈心谈话而提出来的。因此，对被管理者，要坚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对于管理者，建议建立“风险容错”清单，特别是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对努力避免、减轻或弥补损失，并且事后及时报告，但出现一定失误或非议行为的管理人员，应当给予政策保障，让“想作为”不再“顾虑重重”，这样才可以保证柔性管理在实践中得以实施。

（三）共富共享的服务体系：满足少数民族员工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在城市获得越多的保障，形成越多的共同利益，就越容易主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城市管理者，必须主动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全面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合理需求，让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和认同城市。一是开展技能培训。调查显示，90.00%以上企业的少数民族员工培训主要集中于技术和安全意识

方面。但是，“智改数转”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将极大挤压少数民族员工就业领域空间。下一步，统战、民宗、人力资源等部门和社区、职校应多方联动，开展餐饮家政、电子维修等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技之长。二是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坚持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依法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要加强对承担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校的监督，保证他们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积极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低保、廉租房、医保等方面的服务。调查显示，60.00%的少数民族员工离职的原因是家庭因素，如果能够解决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则少数民族员工在N市的主人翁意识将会得到加强。三是深入开展语言文化和政策法规培训。教育水平较低是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共同特征，大专以上的学历只占5.00%左右。这导致他们对法律法规、惠民政策了解不足，再加上语言不畅、社会的融入程度不够，经常会出现“给自己惹上麻烦”或者不配合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情况。因此，可以聘请少数民族大学生担任授课教师，安排消防、卫生健康、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人员到点授课，实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培训全覆盖。

（四）共生共融的交往体系：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格局

管理解决的是“肚子”问题，还需要通过服

务来解决“脑子”的问题，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心灵相契、情感相通。一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由统战部门与宣传部门合作，引导新闻媒介搭建好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桥梁”，既要让该群体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和表达想法的平台，也要注意提高媒体工作者的素养，担当信息传播的“过滤器”和“处理器”，让社会对少数民族人员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二是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生活。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更倾向于同族聚居，保守、排他、封闭的特征明显。为此，要加大公共文化生活的投入，满足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对宗教、饮食、居住、文化、娱乐等生活设施的需求。通过建立文化娱乐设施等缓冲地带，帮助少数民族在心理上平稳融入当地社会。在此基础上，鼓励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积极参加本地的各类社团，开展互动性强、娱乐性广的活动，渐进地促进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融入本地文化中。三是深化精神家园建设。系统总结“红石榴家园”经验做法，引导企业做深做实“红石榴家园”等民族团结进步品牌，鼓励企业充分挖掘各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特色文体活动，创造各民族同胞联袂演出、同场竞技、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平台，广泛开展民族歌舞晚会、民族传统歌曲大赛、民族体育运动等，用文化润泽各族群众的心灵，凝聚同心力量，推动各族人民的深度交融。

责任编辑：蒋建忠